

目 录

胡适致王重民“佚信”发现记	肖伊绯 (1)
胡適和蔣介石「抬槓」之後	潘光哲 (3)
《胡适口述自传》(征求意见稿)	胡适口述 唐德刚整理 张书克重译 (7)
从胡适藏书看杜威对胡适的影响	邹新明 (11)
90年前：邹韬奋专访胡适	肖伊绯 (18)
重读人生与时代的多个“版本”——胡适自传版本新考	肖伊绯 (22)
胡适先生的加拿大轶事	桑宜川 (32)
胡适的作文为什么得满分?	陈 新 (34)

胡适致王重民“佚信”发现记

肖伊绯

两年前的一次春季拍卖会上，胡适（1891—1962）致王重民（1903—1975）的一通“佚信”上拍，引来众多收藏者与研究者的关注。因此“佚信”为《胡适全集》《胡适书信集》《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等多种文献资料集所未载，实为首次出现，自然独具研究价值。在此，笔者不揣陋简，仅据拍卖图录所见，酌加整理，转录此信原文如下：

重民兄：

谢谢你的信。《群书集事渊海》首册送还。

此书见《进呈书目》三 8，是浙江第四次汪启淑进书之一，书目误作《群贤集事》，但四十七卷，二十五册，皆不误。

第四次书与第五次书同月到，皆在卅八年十一月。

来书说此类有戳记有年月的，尚有十多种，我听了很高兴。请将书名及收到年月开列一表见示，至感。

来信所论，不算忠厚。请看抱经在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所作《戴氏遗书序》，可知抱经绝不会想到用一篇《水经注序》的异文来“压东原”或“骄傲东原”。卢氏序文说：

吾友新安戴东原先生于顾亭林、阎百诗、万季野诸老之后，而其学足与之匹；精诣深造以求至是之归；胸有真得，故能折衷群言而无徇矫之失。其著为说也，未尝使客气得参其间；冷然而入，豁然而解；理苟明矣，未尝过聘其辩，以排击昔人而求伸其说。其为道若未足以便易当世之视听，而实至名归，一二名公卿贤士夫洒然异之，声誉遂隆之起。……

很少人这样用气力描写一位死友的。故我深信抱经绝没有不满于东原而要从侧面作“有意的攻击”的。你说是吗？

臧琳曾见钱曾家的《水经注》，似不用疑。刘继庄说黄子鸿“得宋人善本，正其错简脱误，支分缕晰，各作一图。……”此可见《一统志》馆的诸老先生未尝没有见到钱家宋本（是钞宋本，看钱曾的跋），不过《一统志》馆诸老都是用《水经注》的人，而不是校勘《水经注》的人，又其时宋刻的钞本在常熟洞庭山之间并不算罕见，——叶石君家有柳愈钞宋本，钱曾说陆孟龟有影钞宋刻《水经注》，“与吾家藏本相同，后多宋板题跋一叶”，——故他们似不曾特别宣扬。钱曾所记宋板跋，与袁又恺手模的一跋文字小有不同，但互相印证。项网刻本自记也提到一个黄刻本有“虞山钱氏据宋本校定”字样。故钱氏述古堂的钞宋本《水经注》是不用疑的。康熙中人得见此本，也不足奇怪。宋本实有几种不同的本子，如谢兆申所得宋本与天津馆所藏练湖书院钞宋本相同，其优劣皆等于朱谋玮所见本，故宋本未必即能改善朱笈本，何况见宋本者未必能全校一遍乎？如臧琳曾见钞宋本，但能钞一序而已。抱经但见此本与官本序言有小异同，可供校勘，故收入《拾补》，如此而已，不用深求也。

今天魏建功先生给我看一封我在廿六年一月十九日写给他的信，是论《水经注》案的第一信。此信我钞了一份，不可不给你看看！请你阅后仍还给我。（你可以钞一本归“档”！）

此信可见我在 1937 年一月的态度也颇同于你在 1943 年十一月的态度——“觉得此案似是已定之罪案，东原作伪似无可疑。”

信末反对“诛心之论”，乃是第一点反动。后来我稍稍细看静安、心史诸公文，始觉得他们“漏洞”甚多而“火气”太大。但我不久即为国事南行，又不久即去国。倘非老兄重提此案，倘非你力劝我担任此案的覆审，我绝不会费五年工夫作此事。

我写给你们的信，鄙意存在尊处就够了，钞全份此时恐太费罢？改日相见时当再谈。

匆匆敬祝 双安。

适之。卅七，七，二夜。

上述胡适于1948年7月2日致王重民的“佚信”，一通六页，用蓝黑墨色的钢笔写于稿笺纸上。查《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可知，此信是对王重民1948年7月1日来信的覆信，且于2日当天即到达王氏手上。王氏收信后，迅即于当天覆信。以上王氏二信均收入该书中，而胡适此信则未被辑入集中，确为首次面世。

将王氏之前的来信与胡适此信对照，不难发现，二人在关于“水经注案”的学术交流中，不但有着互促共进的“忘年”交谊，起初甚至还有着比较大的分歧与争议。王氏之前的来信中，言及胡适“用直觉而不能用证据说话”，并认定卢文弨与戴震存在学术竞争关系，指出卢氏为了“骄傲东原（即戴震），只有抬出一个宋本来”，而“卢文弨这件法宝（指钞宋本）颇有可疑”。

对此，胡适的回信明确表示反对，且措辞非常直接，没有因“忘年”交谊而语转委婉。胡适在信中称，卢文弨非常看重戴震，甚至在戴去世后写了情深意切的怀念文，是以他“深信抱经绝没有不满于东原而要从侧面作‘有意的攻击’的”。对于王氏提出的钞宋本“颇有可疑”的问题，胡适则表示当时“宋刻的钞本在常熟洞庭山之间并不算罕见”，但在借阅中有使用限制，“见宋本者未必能全校一遍”，因此，对于卢文弨所说钞宋本问题，“不用深求”。为了说明在“水经注案”考证历程中，从一开始怀疑到后来支持戴震之态度转变，胡适甚至专门抄录了一份1937年1月19日致魏建功的信，与此信一道附寄给了王氏，向其表明他也曾有过与王氏相同的观念，只不过那已是六年前的旧观念了。

胡适致魏建功的这一通信件（抄件），1966年时曾由台北中研院辑入《胡适手稿（第一集）》中，之后《胡适全集》《胡适书信集》均据此过录，

如今较易得见。查阅此信内容，可知胡适当年确与王氏意见相一致，信中明确称“我读心史两篇文章，觉得此案似是已定之罪案，东原作伪似无可疑。”信末提到对在史实考据中掺杂“诛心”之论的基本立场，称“若必坐东原以欲得庶常之故而作伪，则稍嫌涉于‘诛心’，凡‘诛心’之论皆新式史家所宜避免”。

有意思的是，在致魏建功的信发出六年之后，胡适以此信抄件附寄于王重民之际，十分直接的表达了对自己六年前的观念的批评与反感。在致王氏信末，胡适称“信末反对‘诛心之论’，乃是第一点反动”；对于先前信奉的孟森（心史）、王国维（静安）等人关于“水经注案”的论文，也表示不再认可，信中称“后来我稍稍细看静安、心史诸公文字，始觉得他们‘漏洞’甚多而‘火气’太大”。

至于信末，胡适提到的“不久即为国事南行，又不久即去国”，乃是指当年粗略认定“水经注案”确系戴震作伪之后，并未对这一学案深入考察，即因“七七事变”爆发，而从北平南下赴庐山、南京与当局商讨国事，不久又赴美出任驻美全权大使。正是在驻美期间，接到王氏来信谈及“水经注案”，胡适方才又重新引起学术兴趣，故而对此案重加考察、持续论证，至写此信时已达五年之久。

所以，虽在信中对王氏观点予以不客气的批评之后，仍在信末坦陈道，“倘非老兄重提此案，倘非你力劝我担任此案的覆审，我绝不会费五年工夫作此事”。读罢胡适此语，即便七十年后的读者也不难理解，胡、王二人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忘年”交谊以及围绕“水经注案”的多年通信，乃是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与“求真务实”的学术旨趣，而这也正是二人至今仍存世二百余封通信（包括新近发现的这一通“佚信”）几乎全部关乎“论学”的根本原因所在。

（作者现居成都）

胡適和蔣介石「抬槓」之後

潘光哲

1958年回台灣擔任中研院院長的胡適，和《自由中國》的實際負責人雷震，固然關係密切；彼此之間，卻不是什麼事都「膩」在一起的朋友。舉例來說，中央研究院在1958年4月10日舉行院士會議，非學界中人的雷震，當然不會是受邀的對象，無緣「恭逢其盛」。然而，長久以來出入於宦場的雷震，自有提供消息情報的「眼線」。() 因此，胡適和蔣介石在這個場合裡公開「抬槓」的事情¹，雷震當天就知道了：

今日聞總統致辭，除稱讚胡先生的道德，並謂提倡固有文化和道德，以為反共復國之用，而胡先生的致詞，說明中央研究院工作，是為學術而研究，與道德毫不相干，雙方意見是大有出入，一說是針鋒相對，惟胡先生措辭甚為得體耳（雷震，「1958年4月10日日記」）。



【蔣介石致詞／國史館藏照片，
檔號：002-050102-00005-025】



【蔣介石致詞／國史館藏照片，
檔號：002-050101-00099-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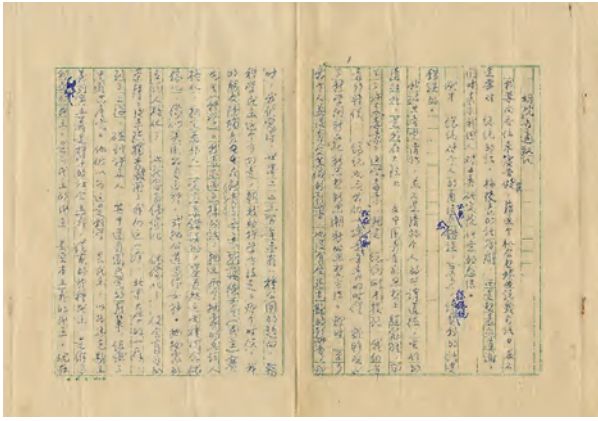
【蔣介石致詞時，胡適翹著二郎腿聆聽／
國史館藏照片，檔號：002-050101-00099-130】

雷震認為，胡適在這個場合裡對蔣介石的回應，「措辭甚為得體」；按諸胡適的講話紀錄，未必如此。胡適當場就說蔣介石的講話「有錯誤」：

剛才總統對個人的看法有錯誤，至少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

爾後胡適將自己的講話紀錄，修改得比較溫和一些：

剛才總統對個人的看法不免有點錯誤，至少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²。



【胡適致詞紀錄】

身與其會的人類學家李亦園回憶，胡適對蔣的回應是，胡一開始就說「總統你錯了」，應該就是這段話稍帶點誇張意味的「口語版」。³

這一席話，聽在蔣介石的耳裡，當場應該不致於如同樣身在現場的史學家呂實強的回憶那樣，「立即佛然變色，站起身來便要走」⁴，證諸胡適與蔣介石等人步出會場的照片，彼此之間，好似還是言笑晏如：



【胡適與蔣介石等步出會場；最右為史語所所長李濟；

蔣介石後著黑色西裝者為總統府秘書長張群／

國史館藏照片，檔號：002-050102-00005-027】

聽到胡適一席話的蔣介石，即便沒有當場「發飆」，心裡實在「耿耿於懷」。勤寫日記的蔣介石，當天以氣憤之情躍然紙上的筆墨，回應了胡適：

雪恥：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最大的橫逆之來，第一次乃是民國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

漢受鮑爾廷宴會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聽胡適就職典禮中之答辭的侮辱，亦可說是求全之毀。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謬至此，真是一個妄人。今後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經驗，而我之輕交過譽、待人過厚，反為人所輕侮，應切戒之。惟余仍恐其心理病態已深，不久於人世為慮也。

朝課後，手擬講稿要旨，十時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參加院長就職典禮致詞約半小時，聞胡答辭為憾，但對其仍以禮遇，不予計較。惟參加安陽文物之出品，甚為欣慰。午課後閱報，晡約請各國使節春季遊會二小時完，心神疲倦，入浴晚課，膳後車遊回寢，因胡事終日抑鬱，服藥後方安眠。

因著胡適的回應而「終日抑鬱」必須得「服藥後方安眠」的蔣介石，第二天的腦海裡，還是纏繞著這件事，揮之不去：

雪恥：昨日的沉痛成為今日的（安樂）自得認為平生無上的愉快，此乃犯而不校與愛人如己的實踐之效也。惟夜間仍須服藥而後睡著，可知此一刺激太深，仍不能澈底消除，甚恐驅入潛意識之中，故應以忠恕克己的仁愛之心，加以化冶，方是進步的勝利之道。今日讀《荒漠甘泉》「一個信徒能不動聲色地忍受苦痛，不僅是恩典，亦是榮耀」之語，更有所感。

胡適儼然成為蔣介石心底的一根刺，怎麼樣都讓他感到不舒服，兩人再見，胡適的一切言行舉止，蔣介石都可以挑出「毛病」：

……晚宴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梅貽琦等。胡適首座，余起立敬酒，先歡迎胡、梅同回國服務之語一出，胡顏色目光突變，測其意或以為不能將梅與彼並提也，可知其人之狹小妒嫉一至於此。今日甚覺其疑忌之態可慮，此或為余最近觀人之心理作用乎，但余對彼甚覺自然，而且與前無異也。

每個禮拜都會在《日記》裡留下反省紀錄的蔣介石，那一週最重要的省思，就是自己被胡適公開「抬槓」這件事了：

胡適就職典禮中，餘在無意中提起其民國八、九年間彼所參加領導之新文化運動，特別提及其打倒孔家店一點，又將民國卅八、九年以後，共匪清算胡適之相比較，餘實有尊重之意，而乃反促觸其怒（殊為可嘆），甚至在典禮中特提餘為錯誤者二次，餘並不介意，但事後回憶，甚覺奇怪。又在星期六召宴席中，以胡與梅貽琦此次由美同機返國，餘乃提起卅八年初將下野之前，特以專派飛機往北平接學者，惟有梅、胡二人同機來京，脫離北平危困，今日他二人又同機來臺，皆主持學術要務，引為欣幸之意。梅即答謝當時餘救他脫險盛情，否則亦如其他學者陷在北平，被匪奴役而無復有今日，其人之辭，殊出至誠。胡則毫不在乎，並無表情。惟彼亦聞梅之所言耳，其心中是否醒悟一點，則不得而知矣。餘總希其能領悟，而能為國效忠，合力反共也。……

因胡適的言行，更使我想念蔡子民先生道德學問，特別是他安祥雅逸、不與人爭的品性之可敬可慕也。⁵

蔣介石面對胡適的這番公開「抬槓」，承受的心理創傷，無以復加，自承是他自從1927年在武漢與蘇聯派遣來的顧問鮑羅廷（Mikhail M. Borodin）發生正面衝突而「受辱」之後，「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最大的橫逆之來」。回顧往昔，1927年初北伐軍事行動大有進展，攻佔武漢與南昌之後，國民政府與國民黨中央究竟應該遷往南昌或武漢，蔣介石與鮑羅廷雙方，激烈爭辯不已。1月12日，蔣赴武漢，當晚在武昌舉行的宴席上，鮑羅廷指責中國國民黨革命有摧毀農工之行為，「詆毀」國民黨領袖中央常務委員會代理主席張靜江，「指責」蔣介石「袒護黨中老朽，喪失革命精神」，「警告」蔣介石不得有反對共黨之舉動。鮑羅廷的批評，「聲色俱厲」，使蔣介石難堪之至，當天日記裡，他指陳自己的感受是：

席間受辱被譏，生平之恥，無踰於此。為被壓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華民族之正氣以救黨國，俾外人知華人非儘是賤辱而不可侮

蔑也。

翌日一早，蔣介石仍然感覺餘恥猶在，心恨未解，當天的日記紀錄曰：

昨晚憂患，終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時起床，幾欲自殺，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

他自稱：要到稍後會客之後，心緒始覺「稍平」。接著，十時蔣介石前往湖北省黨部演講〈加強黨的組訓與改善黨政關係〉，演講完畢，再前往漢口華商賽馬場出席歡迎群眾大會，「到會者約十餘萬人，擁護之聲不絕於耳，踴躍之狀，未曾見也」，會中演講〈革命應依正路進行〉；他參加了這場群眾運動，即使感受很好，也不能減少他的心靈痛苦：

以民眾熱烈之狀，使憂患為之漸息，不能再鼓勇氣，然而痛苦極矣。

即便欲鼓餘勇的蔣介石，對來自鮑羅廷的侮辱恥感，始終深銘在心。1927年1月20日，蔣介石再度回想，又興起自殺的念頭，「一死以謝同胞」，更對國民黨接受蘇聯支持援助的決策，悔悟不已，以為蘇聯的做為，與其他帝國主義帶來的壓迫侮辱，沒有什麼兩樣：

余既不能為國雪恥，何忍為余辱國。今日情況，余惟有一死，以殉國難，為中華民族爭人格，為三民主義留精神，使全國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蘇俄解放被壓迫民族之主義，深信其不誤，然而來華如鮑羅廷等最近之行動，徒使國人喪失人格，倍增壓迫，與其主義完全相反，國人有知，應驅而逐之。……蘇俄同志乎？爾如誠為解放弱小民族，不使第三國際之信用破產，應急自悟，改正方法，不使恢復至帝國資本主義之道路，則世界革命必有成功之一日。否則，余雖一死，不足救國，且無以見已死同志於地下！故余惟願我全國同胞速起，以圖獨立自主，不負總理三十年革命之苦心。余精力已盡，策略已竭，惟有一死，以謝同胞⁶。

時空場域大有不同，蔣介石自己感受到的創傷，好似沒有什麼兩樣。他都有厚望於對方，反而在公開的場合裡，被當場「教訓」了一番；想要當場「翻臉」，勢有不能，只好藉著紙墨，發洩一肚子的怒氣。沒有來自蘇聯的支持援助，國民黨無法改組，蔣介石建軍黃埔，發動北伐，更是「不可能的任務」。鮑羅廷呢，則正像是這股助力的化身；還不是國民黨最高領袖的蔣介石，勢難抗衡。想要「反攻大陸」，一定得仰仗知識人群體的合力，胡適則是這個群體眾所矚望的最高代表；已經是至尊政治權威的蔣介石，面對「學統」領袖的挑戰，終究有所忌憚，不能頤指氣使。一句話，蔣介石非得公開忍辱負重不可。

個體的心靈創傷，可能會對一己的生命歷程，帶來什麼樣漫無邊際的影響，而且反覆再生，揮之不去，沒有人知道。蔣介石對於胡適的負面觀感，持之如此，此後難免不能再私下壓抑，往往宣洩而出。例如，司法院副院長傅秉常聞人言，蔣介石在1960年10月5日國民黨中常會上，公開批評胡適，說他到中研院後，對於「院士及博士之授予，均係以私人關係為主，所予者多屬不當」，還譴責陳誠，「用胡之不當」。陳誠回敬說，任用胡適乃蔣「自己批准」。聞此言，蔣即「嚴詞」稱說：「研究院院長易人及推薦胡適之，既係行政院簽呈到總統府，『我如批不准，汝面子如何下去，我又不欲發生府院之爭』云云」。這番話，讓陳誠「幾不能下台」。蔣「罵興」既起，欲罷不能，復再「責胡等之利用美國人力量為不當」⁷。觀乎蔣介石當日日記的紀錄是：

上午主持值會，對所謂長期發展科學得經費其自私職勢之陰謀，久為學者所痛憤，而辭修推我的意思殊為駭異，當時行政院通過此案後報請我核奪，余即發還不批，只示其凡院會通過之案不應再請示批核，否則余乃該社行政違法之意，而其今日會中竟當面說謊，故不能不直說此案經過實情也，辭修虛偽不成蓋如此乎，可歎（蔣介石日記，抄件）。

證諸蔣介石當日主持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

央常務委員會第二四六次會議指示之一為「長期科學發展計畫及此次由中央研究院辦理參加中美學術合作會議事宜有未盡妥善之處，已交行政院檢討改進」⁸。兩相比對，蔣介石批評的主題，應當是關於胡適主導下的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但是，無論傅秉常聽到的話抑或是蔣介石自己的紀錄，胡適都是蔣實難容忍，必須「開罵」的對象。

至於面對「雷震案」，胡、蔣立場根本「南轅北轍」。立意非讓雷震坐獄繫枷不可的蔣介石，自然聽不進胡適的意見。他既批評胡適「實為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之曰『狐仙』，其乃危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蠱賊，彼尚不知其已為他人所鄙棄，而仍以民主自由來號召反對革命，破壞反共基地也」。胡適去世，蔣介石親撰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自認對胡適「並未過獎，更無深貶之意也」。還洋洋得意地紀錄，認為這幅輓聯「自認為公平無私也」。當他公開出面弔唁胡適，狀極哀慟，當天的日記裡，對胡適卻是貶過於褒：

蓋棺論定胡適，實不失為自由民主者，其個人生活亦無缺點，有時亦有正義心與愛國心，惟其太褊狹自私，且崇拜西風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脫出中國書生與政客之舊習也。



【蔣介石弔唁胡適；右一為胡適長子胡祖望，
右三為總統府秘書長張群】

乃至於蔣介石在3月3日留下的反省紀錄裡聲稱：「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

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1968年1月11日，蔡元培百歲冥誕，中央研究院舉辦紀念活動，蔣介石親臨，認為中研院「環境污穢、設備零亂，毫無現代管理知識，殊為心痛」，他又將這筆帳，算到已經去世了好幾年的胡適身上：

此乃自胡適以至今日院長王世杰所謂新文化之成績也，所謂最高學府如此現狀，何以立國與興學耶？……⁹

總言之，蔣介石日記裡對於和胡適的一切相關事務，統統沒有好話。

去位於台北南港的胡適墓園悼懷的朋友，一定都會看到蔣介石「智德兼隆」的題字；蔣介石致贈的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往往被人津津樂道。然而，蔣介石這幅輓聯，既深陷於將新、舊必可截然二分，不可調和的對立思維；也完全展現了他和胡適的思想世界，距離多麼遙遠。胡適畢生不以三綱、五倫這種「舊道德」、「舊倫理」為然，焉可願為「楷模」或「師表」？胡適的地位，怎麼會需要政治權威做出這樣的「蓋棺論定」呢。

知識人和政治權威之間，彼此相衝突矛盾，從來不曾停止，也不會停止。雙方之間相存共生的張力，緊繃難弛，卻往往以前者遭遇諸如「身

世浮沉兩打萍」的悲劇為收場。胡適和蔣介石的公開「抬槓」，固然是知識人對政治權威懷持異議的展現；相對的，想要鎮抑打壓而勢所不能的政治權威，最後只好訴諸筆墨，發怒洩恨。知識人與政治權威之間的對決場景，卻值得我們再三沉吟。

（作者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胡适纪念馆主任）

¹ 參考：潘光哲，〈胡適和蔣介石的抬槓〉，《隨筆》，2008年4期（2008年7月），頁146-153。

² 〈胡院長適致詞〉，胡適紀念館藏「南港檔」，館藏號：NK01-213011001。

³ 李亦園，〈本院耆老話當年〉，《中央研究院週報》，期992（台北：2004年10月21日）。

⁴ 呂實強，《如歌的行板——回顧平生八十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頁213。

⁵ 以上段落，參考：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台北：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4），冊11，頁36-38。

⁶ 以上段落，參考：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卷1，頁137、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冊2，頁7-9。

⁷ 傅秉常（著），傅錡華、張力（校註），《傅秉常日記：民國四十七—五十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頁413。

⁸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冊11，頁379。

⁹ 以上段落，參考：《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冊11，頁384、頁539-540、頁542、冊12，頁485。

《胡适口述自传》

（征求意见稿）

胡适口述 唐德刚整理 张书克重译

第十八章 给文学革命补充两个注脚

今天我想为文学革命再加上两个注脚。首先，我想对中国文字是整个语言运动和文学改良的基础这一点再多说几句。我要指出的是，欧洲现代国家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兴起的过程中，具有几个重要的相同之处。其一是该国民族语言（“国语”）的选择。该种语言是如何选定的呢？每一国

的民族语言一开始的时候总是某地的方言。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相同之处。某一方言要想成为该国的民族语言，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使用最为广泛。以意大利为例。现代意大利语最初是托斯卡纳地区的方言。当时意大利还没有统一，不过托斯卡纳地区的方言却最为流行，因而有资格成为意大利的国语。法国的情况也一样。当初

有两种方言在进行竞争：巴黎地区的方言与普罗旺斯地区的方言。因为是首都和大商业中心，巴黎地区的方言最终胜出。英国的情况也是如此。现代英语最初是英格兰中部地区的方言。该方言地区包括伦敦以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两个大学。说这种方言的人最多，懂这种方言的人也最多。

因而，某种方言要想成为国语，第一个条件便是具有最为广泛的流通性。在中国，后来被尊奉为“国语”的白话，原本就是“官话”。在所有方言中，这种“官话”使用最广，覆盖的面积占中国总领土的90%，涉及的人口可能在75%左右。从东北的哈尔滨到西南的昆明，从北京到南京，人们都说这种语言。如果你从哈尔滨到昆明（滇缅公路的起点）画一条直线，这条线大约有4000英里。该直线上任何一处的居民都不会感到有改换自己语言的必要，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语言很普通，是最为通行的语言。

方言能够成为国语的第二个条件是，最好这种方言曾经产生过一些文学作品。但丁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为方言辩护。他在文章指出，托斯卡纳地区的方言不仅是意大利使用最广的语言，而且还曾经产生过诗歌作品。他提到他的众多先驱；这些比他早的诗人曾经使用托斯卡纳方言创作诗歌和故事。在法国，巴黎方言中也出过很多诗人，比如著名的弗郎索瓦·维庸；普罗旺斯方言中则出了很多吟游诗人，他们唱出了众多优美的诗篇。也就是说，这两种方言都产生了丰富的文学作品；主要是由于首都的政治影响，使得巴黎方言战胜了同样优美、同样具有文学意味的普罗旺斯方言。英格兰中部地区方言也是如此。乔叟就是使用这种语言创作了著名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早期的翻译者将《圣经》翻译成英语时，使用的也是这种方言。后来的詹姆士国王版《圣经》（1611年），也是用这种方言译出的。直到现在，这个版本还是最为重要的《圣经》英译本。

中国国语的发展也有相似之处。中国的“官话”包括北京方言、华北方言以及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方言。严格意义上的北京方言“北京话”产

生了《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小说；至于广义上的“官话”，则产生的小说更多，最早的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大量的“官话”文学作品使得它完全有资格成为中国的国语。

方言能够成为国语的第三个条件是：文人们对某一方言的文学价值自觉予以承认、主动予以弘扬。在欧洲国家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兴起的进程中，这种有意识的提倡通常是很明显的。但丁不仅使用托斯卡纳方言创作了他的伟大巨著《神曲》，甚至还专门写作并出版了一篇论文《为方言俗语辩护》。在这篇文章中，他解释了为什么不用拉丁语而偏要用托斯卡纳方言来写《神曲》。

而在中国，也许正因为缺乏这种有意识的提倡，才使得1000年来文人们忽视和贬低“官话”的价值，认为它在文学上不足挂齿。经过几年有意识的提倡，就把这种长时间被鄙弃的“方言俗语”提升到了“国语”的崇高位置。

以上是我的第一个注脚。我想，上述有关“成为国语之条件”及“有意识提倡之重要性”的说法，有助于解释前面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何以40年前的文学革命相对比较容易就获得了成功。

我的第二个注脚是：所谓“中国文学革命”的整个过程，证明了我一向呼唤的“系统思维的实证理论”。中国文学革命始于我们这帮爱好文学的朋友们之间一系列友好的争论。那时候，我们这帮人分散在康奈尔、哈佛、哥伦比亚等各个美国大学的学生宿舍之中。那时候，我们面临着真实的难题，感到困难、犹疑和彷徨。这些疑虑和困惑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当然，这些辩论通常情况下都是十分友好的。最开始，争论的问题只涉及“诗之文字”。后来，问题扩大到文学的工具问题——活的中国的活文学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提出了一些假设。一些人偏重文学的内容；其他人（比如我自己）则特别强调语言工具、语言媒介的重要性。最后，问题的范围缩小为提倡以大众的语言（“白话”）作为文学的工具。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活语言能否用于创作所有形式的文学？事实已经证明，白话能够成为创作“通俗”小说的有效工具；剩下

的问题是：白话能否成为作诗的有效工具？我的一些朋友对此感到怀疑；我则力主可以。最后进入验证阶段：如何验证“白话能作诗”或者“白话不能作诗”的假设。可以说，诗是当时唯一未被白话征服的领域了。我的建议是：有意识地、自觉地使用白话来写诗；也就是说，要自觉地抱着一个证实某一假设、解决某一疑问的目的。

我把文学革命的过程分成上述不同的阶段来讲述，是为了说明：文学革命是持续性的、有意识的思维过程的一个具体例证。首先是有了疑难问题，接着是提出假设，最后的阶段则是：通过试验对选定的假设进行验证。因而，我的第二个注脚便是：整个文学革命运动（至少是它的早期阶段），用实验主义的词汇来说，的确是一个系统性的、硕果累累的思维过程。也就是说，文学革命涉及的问题其实是：如何使用思想工具去解决问题。

第十九章 中国的文艺复兴及其四重意义

事实上，语言改革只是我们经常提起的一场更大规模文化运动中较早、较重要、可能也是较为成功的一部分而已。有时候，我们称这场更大的运动为“新文化运动”，意思是说，中国的古老文化已经腐朽，需要发动一场运动来使它返老还童。这一运动有时候也被称为“新思潮运动”。这一运动强调的是外来思潮的多样性：无政府主义者致力于从欧洲引进无政府主义的著作；社会主义者试图介绍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德国学习过的哲学家则忙于介绍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等德国思想家；留学英美的人则试图介绍洛克、休谟、贝克莱等人的思想；在美国受过更为现代训练的学生则试图引进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

我本人更喜欢把这场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当时，北京大学有一批思想成熟的学生，比如傅斯年、汪敬熙、顾颉刚、罗家伦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他们受到这场北大教授领导的文化运动很深的影响，组织了一个社团，并且办了一份自己的刊物。这份刊物的中文名字为“新潮”，英文名字则为“The

Renaissance”。

这些年轻人邀请我作他们的指导老师。他们把整个运动称为“文艺复兴”可能是受了我的影响。这些成熟的年轻学生都曾经受过良好的传统学术训练，在受到本校年轻教授的影响后，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们显然认识到，在北大校园里正在发生的这场新运动，和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有相似之处。

那么他们发现的这些相似之处有哪些呢？我们回顾一下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就会发现，这场运动始于新文学、新艺术、新科学、新宗教之诞生；它并且导致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展示出的宏大规模和中国文化运动当时呈现的广阔领域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说得更具体一点，他们清晰地看到，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有一种对新语言、新文学、新工具的渴求，也就是一种对新的自我表达工具的渴求。尽管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还没有涉及艺术领域，不过，对这些思想成熟的大学学生来说，中国文学革命已经展示出了与欧洲文艺复兴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的确就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它有意识地承认、恢复和提升了千年以来一直逐渐发展着的、以白话故事、小说、戏曲、歌谣为表现形式的活文学传统。

他们还明确承认另一项巨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对人的解放的渴求，即，要求把个人从旧的传统、习俗、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欧洲的文艺复兴的确是个解放的年代，个人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人，主张着自己的权利和自由。

中国新思潮运动的最初几年，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社会上存在对妇女解放的要求，并且极为关心个人的权利。我的同事周作人先生认为，仅仅使用白话文创作文学作品是不够的；新文学还必须要有内容；他把这种内容称之为“人的文学”。“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有着自己的欲望、感情、想法以及优缺点；这些都该成为新文学的基础。那几年，曾经发生过好多次讨论。讨论的话题不仅包括个人自由问题，比如两性关系、

爱情与婚姻、贞操问题等等；还包括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家庭革命”这一著名的说法就是当时流行一时的新词汇。

也许正是以上这些相似之处使得那批思想成熟的学生们把自己的刊物叫做“The Renaissance”。我必须再补充一句：事实上这份《新潮》月刊相当不错，编写俱佳。它让我们这帮教授们自惭形秽，也令我们办的《新青年》相形见绌；相比之下，《新青年》杂志既不厚重，也编辑欠佳。

有点儿偏离我的主题了。我的主题是：我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称来称呼这场运动；因为，这个名称能够涵盖更多的内容，并且更能表述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因而在我的英文著作中，我喜欢称这场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在当时，“Renaissance”这个词很难翻译成确切的中文。我想，正因为如此，北京大学那批学生未能给他们的刊物找到更好的名字，只好称之为“新潮”；但是他们毫不犹豫地使用“The Renaissance”作为他们刊物的英文名称。

这一运动进行了几年以后，自然有许多人试图确定其具体含义。1919年初，《新青年》月刊的编辑陈独秀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在这篇文章里，他没有试图给这场运动下一个抽象的定义，而是供认，我们的杂志犯下了两条罪状。当时，有很多保守人士或者反动分子批评新文学运动，批评的矛头集中在北京大学身上。陈独秀认为，有必要承认《新青年》的两条罪案：“第一，我们拥护赛因斯先生；第二，我们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他还说，正因为我们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提倡那新文学、新艺术、新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所谓的国粹主义。

1919年11月1日，我写了一篇长文《新思潮的意义》。我引述了当时有关这一运动的一些定义后指出，这些定义都太含糊、太笼统了。我说根据我个人的观察，这场新运动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做“评判的态度”。我接着指出，这种“评判的态度”已经被用于许

多不同的领域：传统的制度风俗、古代圣贤先哲的教导等等，最后还被用于评判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模式。

我总结说，尼采所谓“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正可以概括这场新运动。我的这一概括定义强调了一种新的评判的态度。但在具体应用上，这种评判的态度生动地体现在这场运动的三个具体方面。第一，是研究当代的具体问题。我列举了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孔教作为国教、作为国家道德标准的问题。（民国初年，尤其是袁世凯出任总统期间，出现了一股反动思潮，试图以孔教为国教；袁世凯死后，新宪法的起草者也讨论说，要以孔教为中国人道德教育的标准。）此外，语言与文学问题，也就是如何进行文学改良的问题；国语统一问题；女子解放问题；贞操问题；婚姻问题、教育改良问题、父子关系问题；戏剧改良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当时有待研究的具体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从海外输入学理。我说，输入这些新观点、新理论，主要是为了帮助解决我们今日面临的实际难题。《新青年》杂志曾经出了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伟大的挪威戏剧家；我写了一篇《易卜生主义》，作为这期专号的首篇专论。《新青年》还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新教育》月刊则出了一期“杜威专号”。至于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德国思想家、英美思想家、法国哲人的蜂拥而入，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不过我说，还有第三个方面，那就是，我们对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问题。我认为，这些传统学术思想同样需要经受评判态度的考验。这一点我称之为“整理国故”。“国故”这个词即使在现在也受到很多的批评和反对。不过这个词不是我们发明的。是当时一位甚有名望的国学大师章炳麟（别名太炎）最早使用这个词的。章氏当时写了一部很有名的著作《国故论衡》。“故”的意思是“死的”或者“过去”。（章氏同时也是一位革命家。“苏报案”发生后，他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受到审判，之后坐了牢。《苏报》是当时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家革命报纸。章炳麟和《苏报》

年轻的编辑邹容一起被判了几年监禁。邹容在刑期期满前死于牢中；章炳麟则熬过了刑期，获释后去了日本，成为革命杂志《民报》的编辑。《民报》当时在留日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很多留日中国学生经常使用各种方法把《民报》带入中国；有时候，甚至在偏远的内地也能发现《民报》的影子。不过，章炳麟在本质上是一位传统的学者，并且门生甚多。他的一些学生在北大任教。文学革命早期支持者中的钱玄同先生就是章氏的学生，对中国古文字学甚为精通。章氏门人中，也有不少人反对以白话代替文言。比如同为北大教授的黄侃。黄氏是湖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字学家，在该领域有着原创性的贡献。这个注脚够长了。）

在我看来，这场新运动很重要的一点是：对我们的文化传统进行系统性的检验和改造。

在这篇文章里我指出，这一运动的以上三个

方面必然会导向第四个方面，那就是：再造文明。认真研究现实问题，输入新观念、新思想来帮助我们理解和解决难题，以评判的态度来研究和改造我们的文化传统，这场运动最终就会产生出一个新的文明、一个新的文化来，我们的固有文明就会得以再造。

以上就是我对我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基本含义的理解。接下来的几次记录里，我将会更为详尽地展开叙述，并举出其他方面的情况，还将说说我和信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发生冲突的情况。早在1919年，整整40年前，共产主义者就成了我的主要对手。那时候我就开始认识到，这场运动的第二方面“输入学理”有走向教条主义的危险。不过我首先要谈的是，一场政治干扰阻碍了这场运动的发展，并且使得这场运动改换了方向。

从胡适藏书看杜威对胡适的影响

邹新明

关于杜威对胡适的影响，已有很多论述。远者如1935年郭湛波在其所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就指出：“胡氏是介绍杜氏思想最有力的人，他的治学及著述的方法，都是杜氏的方法。”

^[1]近者如罗志田教授曾发表题为《杜威对胡适的影响》的专文，他认为，胡适“不但在哲学方法上把握了杜威思想的基本精神，更像杜威一样希望把哲学从‘哲学家的问题’中解放出来，使它变作‘一般人的问题’，其主张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改造社会’，尤其是杜威思路的亲切体会和运用。”^[2]

至于胡适自己，则多次强调杜威对自己的深刻影响。胡适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

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3]

胡适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又明确指出：“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4]

1952年6月1日，胡适接到杜威夫人的电话，得知杜威于当日去世，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总结说：“杜威先生的思想，影响了我一生。”^[5]

根据胡适自己的说法，杜威对其思想和治学都有深刻而重要的影响，并且持续一生。关于杜威对胡适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已有很多争论，笔者孤陋，不敢妄加评论。笔者在整理胡适藏书的过程中，对与杜威有关的图书颇有留意，经过梳理，认为胡适对杜威著作的研读，比较集中的，大致可以分为留学美国、杜威来华讲学和任驻美大使三个时期，兹略加介绍。

一. 胡适留美期间对杜威著作的阅读

胡适留美七年曾记有大量的日记和札记，1939年4月由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1936年7月12日，胡适在为该书所作的《自序》中指出，这些札记记录了自己“信仰思想的途径和演变的痕迹”。胡适随后解释说：“在这里我要指出，札记里从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的绝大影响。这个大遗漏是有理由的。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了详细的英文提要，都不曾收在札记里。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6]

胡适在这里再度强调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对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的“绝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说自己在1915年的暑假“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而笔者在胡适藏书中查到的能确定是胡适1915年前购买并阅读的杜威著作只有以下一种：

Ethics, by John Dewey, James H. Tufts,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8。本书题名页钤有“适盒藏书”朱文圆印，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1914。”书内221页有胡适批注圈划痕迹。批注以英文为主，间有中文，有“此亦未必尽然”，“吾国之伦理学说大半注意此点”，“此意吾向所未思及”，“此说甚是，平允之言”，“此言是也”等评语。胡适在书中批注圈划之处很多，表明胡适确曾用心研读。此书极有可能是胡适1915年暑期阅读过的杜威著作。

虽然我们可以说胡适阅读的杜威著作不一定仅限于自己的藏书，他可以从图书馆借阅，我们也可以说，现存胡适的藏书中杜威的著作不一定完整，他当时阅读的杜威著作有可能遗失。但笔者认为，胡适所说在一个暑假“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恐怕是过分夸大之词。

除了上述胡适藏书中的证据外，笔者认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从杜威当时的著作数量看，要在一个暑假读完，并且做“详细的英文提要”，难度很大。第二，根据胡适的日记和书信，胡适在1915年暑假专门攻读杜威著作的时间也不是很多。

关于杜威的著作，笔者简单检索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馆藏，由于1915年当年出版的图书月份不能确定，暂时不计，笔者仅限定1907-1914年间出版的杜威的著作，共查到以下七种：

1. The school and the child : being selections from the educational essays of John Dewey, London : Blackie & Son, limited, 1907, 128P.
2. Ethics, New York: H. Holt and company, 1908, 618P.
3. Moral Principles in Educ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09, 60P.
4. How We Think, Boston: D.C. Heath and Co. 1910, 228P.
5. 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in contemporary thought, New York: Henry Holt, 1910, 309P.
6. Educational essays, London: Blackie & Son, limited, 1910, 168P.
7. Interest and effort in educ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3, 101P.

这七种图书共计1612页。试想，在一个暑假之中，能认真读完这些著作已非易事，更何况还要做详细的英文提要？

再来看胡适1915年暑假的主要时间安排。我们知道，胡适决定离开康奈尔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追随杜威，就是在那一年的暑假。据胡适日记，他比较彻底想离开康奈尔大学是在1919年7月5日。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此间不可以久居矣。即如今日下午，方思闭户读书，甫尽二十页，而吕君来访，吕君去而Mr. Coughram来访，未去而Mr. Theodore来访。而半日之光阴去矣。吾居此五年，大有买药女皆识韩康伯之概。酬应往来，费日力不少，颇思舍此他适，择一大城市如纽约，如芝加哥，居民数百万，可以藏吾身矣。”^[7]此时胡适还未最终确定去哥伦比亚大学。同年7月11日，胡适在写给母亲的家书中，明确说自己考虑去哥伦比亚大学。胡适在信中说：“儿近思离去绮

色佳，来年改入哥伦比亚大学。……儿所以欲迁居者盖有故焉。”在随后胪列的七条迁居原因中，第七条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师杜威先生乃此邦哲学泰斗，故儿欲往游其门下也。”^[8]1915年7月14-15日，胡适在给其红颜知己韦莲司的信中说：“I have decided to leave Ithaca next year. Columbia have been under consideration for a long while.”^[9]此信表明胡适当时已经大致想去哥伦比亚大学，但还没最终确定。到同年8月4日，胡适在给韦莲司的信中就非常确定要去哥伦比亚大学了：“I have definitely decided to come to Columbia next year. Will leave Ithaca the last part of September.”^[10]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推定，胡适确定去哥伦比亚大学的时间是在1915年8月初。

前引胡适家书开头说：“一月以来，因学年休假在即，课极繁忙，竟无暇作书，至今日始得暇操笔。”^[11]大致说来，胡适那一年的暑假开始的时间至早在七月初前后。就算是胡适在当年八月初确定去哥伦比亚大学之前已经开始阅读杜威著作，做些准备，开始的时间也应在基本确定到哥大追随杜威之后，也就是大致1915年7月11日那封家书之后。

笔者翻检胡适日记及书信，胡适从1915年7月11日到9月20日离开绮色佳，主要做的事情有：

7月13日，致信族叔胡近仁，纵论中西小说，洋洋约三千言。

7月23日前后，“连日读《墨子》《经上》《经说上》《小取》三篇，又读《公孙龙子》三篇。”^[12]

7月27日，“读英人高尔华绥(John Galsworthy)之讽刺小说两篇”^[13](全集第167)

8月2日，“为《科学》作一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凡三昼夜始成，约一万字。”^[14]

8月3日，读白居易《与元九书》。

8月4日，读白居易诗。

8月21日，“承此间律师罗宾生君(James R. Robinson)招往其湖上夏季别墅为两日之留。”^[15]

8月25日前后，为在康州密德镇举行的研讨会作“How to make the written language of China

teachable”。

8月31日，“读俄人屠格涅夫(Turgenev)名著小说《丽莎传》(Lisa)。”^[16]

八月底九月初，在The Outlook上发表了一篇“China and Democracy”的文章，可能作于此段暑期。

9月7日，“读奥斯本(Thomas Mon Osborne)之《狱中七日记》(Within Prison Walls, New York, 1914)。”^[17]“读韦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名著The New Machiavelli。”^[18]

此段时间胡适写长信，用三昼夜作中文长文，作英文论文，读中外名著、小说，抽空小憩，为准备博士论文阅读《墨子》及《公孙龙子》……，相当充实。此外，胡适还写了45篇札记，临别绮色佳与任鸿隽等友人诗词唱和。也正是在那个暑期，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等留学生朋友开始讨论文学革命的问题。可见，胡适在那个即将离开绮色佳的暑期相当忙碌，留给他“发愤”读杜威著作的时间可能不是很多，如何能够“尽读”，实在令人不解。

胡适到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既然师从杜威，阅读杜威的著作是常理中之事。从胡适藏书看，可以基本断定为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阅读的杜威著作主要有以下四种：

1. *Schools of To-Morrow*, by John Dewey, Evelyn Dewey,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1915. 本书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 Suh Hu, Dec. 1, 1915, New York. 书内数页有胡适朱笔圈划。本书1915年出版，胡适的签名为同年12月，因此大致阅读时间应为1915年底，或者之后。

2. *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 by John Dewe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6, 精装一册。本书扉页有胡适题记: Suh Hu, New York, July, 1916. 杜威著《实验的名学》。书内多处有胡适批注圈划。此书大致应为胡适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期间所读。

3.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by John Dewe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6, 精装一册。

本书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 Suh Hu, June 1916. 书内 P.138-139 间夹有纸条一张。此书阅读时间应在 1916-1917 年间。

4. Creative Intelligence: Essays in the Pragmatic Attitude, by John Dewey, Addison W. Moore, etc.,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7, 精装一册。本书书名页钤有“胡适藏书”朱文方印。扉页有胡适题记四处:

1. Shih Hu, New York City, Feb. 1917. 2. 实验的态度, 适。

3. 吾译此书名思之月余不能满意。昨夜床上得此译法, 恐亦不能佳耳。六年六月三十日太平洋舟中。“建设的聪明”

4. “创造的思想”。八年三月重用这个直译法。

书内 191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中文批注有“此语真费解”、“此即孔子‘好德如好色’之意”、“此即古人知足安命之说之所由起”等语。此书应为胡适 1917 年归国前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从对书名翻译的斟酌和大量批注圈划看, 胡适对此书非常重视。

二. 杜威来华讲学前后胡适对杜威著作的阅读

胡适到北大之前, 虽因倡导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 但到北大之后, 在学术上还急需有影响的著述, 以便在北大站稳脚跟。经过将近一年的讲课积累, 胡适于 1918 年 9 月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书稿寄给商务印书馆, 该书于次年 2 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如释重负的胡适, 开始着手做一些计划中要做的事情, 其中就包括西方短篇小说的翻译和杜威著作的深入阅读。就在胡适 1918 年 9 月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书稿后一个月, 他向日本丸善书店订购了 17 册哲学书, 其中有 7 册缺货, 丸善书店直接向出版社订书, 这其中就包括杜威的 *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19]向丸善书店订书时, 距胡适与陶知行、蒋梦麟等人酝酿邀请正在日本讲学的杜威来华尚有五个月的时间。据此, 我们可以确定, 胡适回国后重新开始阅读杜威, 直接的原因不是杜威来华讲学。

在胡适藏书中, 笔者找到了由日本丸善书店为胡适直接向出版社订购的杜威的那本著作, 具体信息如下:

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in Contemporary Thought, by John Dewe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0, 精装一册。本书扉页有胡适题记: Hu Suh, March 1919. 书内 53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书末有胡适批注: “Read this essay together with his ‘The Recovery of Philosophy’ in ‘Creative Intelligence’.” 从上述信息看, 这本书到 1919 年 3 月才到胡适手中。胡适阅读时, 重读 *Creative Intelligence* 一书中杜威的文章, 互相参考。

此外, 上海的 Edward Evans & Sons 图书公司在 1919 年 3 月 11 日和 18 日分别寄给胡适两批书, 共九册, 其中一册是杜威的 *Germa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20]。陶知行给胡适写信告知杜威在日本讲学是在 1919 年 3 月 12 日, 考虑订书周期等因素, 胡适订购杜威这本著作大致也与杜威来华讲学无关。

笔者在胡适藏书中也找到了杜威的这本著作, 具体信息如下:

Germa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by John Dewe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5, 精装一册。本书扉页有胡适铅笔签名: Suh Hu, March 1919. 书内 15 页有胡适圈划。

从现有史料看, 胡适最初得知杜威到日本讲学, 大致是收到陶知行 1919 年 3 月 12 日书信之后。因此, 胡适在同年 3 月 9 日开始在教育部会场作的四次介绍实验主义的演讲, 与上方面提到的胡适订购的两种杜威著作一样, 极有可能与后来杜威来华讲学是机缘巧合, 而非有意的事先准备。胡适的此次演讲分七部分, 前半部分主要介绍了实验主义的历史和詹姆士的学说, 后半部分主要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 包括哲学观念、论思想、教育哲学等内容。胡适后来将此七篇“实验主义”演讲收入《胡适文存》第一集第三册。他在 1921 年 7 月 4 日的日记中说: “我当初本不想把《实验主义》全部抄入, 现在仔细看来, 这

几篇确有存在的价值。恐怕现在英文的论‘实验主义’的书，如 *Murray Pragmatism* 之类——没有一部能比我这一本小册子的简要而精彩。”^[21]

1919年4月30日，杜威到达上海，胡适与陶知行、蒋梦麟到码头迎接，并于5月2日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介绍实验主义要旨，作为第二天杜威演讲的导言。五月，胡适在《新教育上》“杜威专号”上发表《杜威的教育哲学》《杜威哲学的根本概念》《杜威之道德教育》《实验主义》，全面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学说。杜威在华两年多，在北京、山西、天津等地的主要演讲，都是胡适现场作翻译。据胡适日记，他在1921年着手翻译杜威的《哲学的改造》。当年4月30日，胡适在前往天津的火车上重读杜威的《哲学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第一章，改译为《正统哲学的缘起》^[22]。5月12日，翻译《哲学的改造》两页。5月13日译《哲学的改造》两页。^[23]后来胡适与唐肇黄合译此书，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笔者在胡适藏书中找此书的1920年版两册，大致信息如下：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by John Dewe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0。一册扉页钤有“HU SHIH”蓝文长方印。书内49页有胡适批注圈划。书内有夹纸三张。从胡适的批注圈划和夹纸情况看，胡适对此书非常重视，为阅读和翻译此书用力甚多。另一册扉页有胡适毛笔题记：“Hu Shih, Hangchow, 1923.”书内夹有纸条一张。

此外，可以大致确定为胡适在1920年代阅读的杜威著作主要有以下两种：

1. *How We Think*, by John Dewey, Boston, New York, Chicago: D. C. Heath & Co., 1910。本书扉页有胡适铅笔签名：Hu Shih，另钤有“王徵”朱文椭圆印。书内92页有胡适批注圈划。

笔者曾根据胡适藏书英文签名情况，确定胡适英文名字由 Suh Hu 改为 Hu Shih 的时间大致为1921年。本书胡适的签名已经是新英文名字，因此胡适阅读本书的时间有可能是在1921年之后。

此外，本书所钤印章“王徵”，应即王文伯，王文伯早年留美时与胡适结识，其后二人交往较多。

2. *Experience and Nature*, by John Dewey, Chicago, London: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1925。本书胡适藏有两册，一册扉页有胡适毛笔题记：“杜威先生送我的。适。十四，四，二。”另一册扉页有胡适题记：“Hu Shih, March, 1926.”“杜威先生的《经验与自然》。胡适。”书内60页有胡适批注圈划。此书大致阅读于1920年代，从批注圈划来看，胡适对此书也非常重视。

三. 胡适任驻美大使前后对杜威著作的阅读

1937年9月，胡适与钱端升等人赴美，宣传中国抗战，次年9月出任南京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直至1942年9月。此后胡适继续留居美国，主要从事《水经注》研究，1946年7月回国。胡适抗战期间在美近九年，与杜威多有接触。与杜威有关的最重要的活动是1939年10月参加杜威八十寿辰纪念。

胡适抗战期间在美国的前五年，即卸任驻美大使之前，主要为国事奔走，能够集中阅读杜威著作的时间想来不多。据胡适日记，他在1939年10月17日读完杜威的 *Liberalism & Social Action*，胡适“觉得这书真是一部最好的政治思想书。”并认为“此书的最精彩的部分在于第一章的历史的叙述。”^[24]在次日的日记中，胡适记有“写短文‘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25]很显然，胡适阅读此书是为了参加纪念杜威八十寿辰的活动。10月20日，胡适参加了杜威八十岁生日纪念聚餐会，并有发言。10月22日，胡适参加 *Conference on Methods of Philosophy*，宣读了前文提到的短文。

笔者在胡适藏书中找到了胡适阅读的那本 *Liberalism & Social Action*，具体信息如下：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by John Dewe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35。胡适藏书有两册。一册书名页钤有“HU SHIH”蓝文印。书内77页有胡适批注圈划。可见胡适为了作文，

阅读还是很仔细的。另一册扉页有原书主题记：

“Y.C. Koo, Shanghai, December 1935”，Y. C. Koo 应即民国时期经济学家顾应昌。此书或为顾氏赠送胡适。

此外，胡适藏书中还有一种杜威著作，是他为作文庆祝杜威八十寿辰而阅读的：

Characters and Events: Popular Essay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by John Dewe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9. 本书扉页钤有“HU SHIH”蓝文印。书内 54 页有胡适圈划。书末有胡适题记：“‘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的第一章即是如此说。此讲在 Nov. 1918, Dewey 不久即渡海到日本，讲‘Reconstruction’。以文字论，此讲有甚精彩处。我将来若译完‘改造’，定译此文为附录。适，Oct. 17, 1939。”此书与上面提到的 *Liberalism & Social Action* 同一天被胡适阅读，可见胡适准备祝寿短文非常仓促。此外，本书胡适藏书中另有一册，仅钤有“HU SHIH”蓝文印。

同样因为杜威八十大寿的原因，10月23日，胡适与杜威的弟子 Joseph Ratner 吃饭，Rater 赠给胡适一本杜威的著作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胡适藏书中此书，具体信息如下：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by John Dewe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7, 精装一册。本书扉页有 Joseph Ratner 题记：“To Dr. Hu Shih, in remembrance of a memorable afternoon. Joseph Ratner. Oct.23-24, 1939.”

胡适日记中说“饭后我与 Rater 大谈。”^[26]此次畅谈应该是过了午夜，故 Ratner 赠书的日期写作“Oct.23-24”。本书内 90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第 74 页文末有胡适“这一段与我的主张最相近，Dewey 来信所指即此一节”批语。胡适在 10 月 23 日的日记中说：“把我的‘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短文送给 Dr. Dewey，加上一短信，请他不客气的批评我”^[27]胡适批语中说的“Dewey 来信”，应即为杜威看过胡适短文之后提出的修改参考意见。

Joseph Ratner 是杜威的弟子，曾著有《杜威哲学》，是庆祝杜威八十寿辰论文集的编辑之一。同

年 11 月，胡适与其有书信往来，主要内容为将胡适的短文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 收入论文集。Rater 的赠书对胡适修改论文应有帮助，胡适大致阅读于 1939 年底前后。

1940 年，纪念杜威的论文集由纽约 G. P. Putnam's Sons 出版公司出版，题名为：*The Philosopher of the Common Man: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Dewey to Celebrate His Eightieth Birthday*。书中收录了胡适的文章“*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应即胡适 1939 年 10 月 22 日在研讨会上宣读的“*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论文题目的修改，或许来自杜威的意见。

胡适藏书中有此纪念文集三册，其中一册扉页有胡适题记：“杜威先生八十岁生日（一九三六，十月二十日），一班老朋友，老学生，给他做寿，有几篇论文收在这本小册子里。今天我把这小书送给文伯，祝他和杜威先生享同样的高寿，并且享同样的健康。适之 卅三，二，十四 纽约，东八一街。”此书应为拟送给朋友王徵（文伯）而未送出者。本书另一册扉页有胡适题记：“去年十月为杜威先生作纪念论文一篇，今年从头改作，收在此集里。胡适，廿九，五，一。”本书第三册没有印章、签名等痕迹，只是一般的复本。

此外，胡适藏书中还有一本他人关于杜威哲学的著作，具体信息如下：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 A Critical Analysis, by W. T. Feldma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4, 精装一册。本书扉页钤有“HU SHIH”蓝文印。扉页另有胡适钢笔题记：“Oct. 20, 1939,- Dr. Dewey's 80th birthday.”根据胡适所署日期，此书大致为胡适参加杜威八十岁生日纪念聚餐会所得。

四. 胡适其他时期阅读的杜威著作及其他有关藏书

除以上较为集中的时期外，从胡适藏书

看，胡适阅读的杜威著作还有 3 种：

1. *Individualism Old and New*, by John Dewey, New York: Minton, Balch & Company, 1930, 精装一册。本书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Hu Shih。另题名页钤有“HU SHIH”蓝文印。书内数页有胡适铅笔圈划。此书大致阅读于 1930 年代。

2. *A Common Faith*, by John Dewe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精装一册。本书扉页有胡适题记：Hu Shih, December 22, 1937。书内 41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有“大胆的话”、“范文正之名言亦如此”等批语。此书大致阅读于 1930 年代。

3. *The Living Thoughts of Thomas Jefferson*, by John Dewey, New York, Toronto: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40, 精装一册。本书内 50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此书大致阅读于 1940 年代。

此外，胡适藏书中，有胡适签章但无批注圈划痕迹的杜威著作两种：

1. *The School and Society*, by John Dewe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5, 精装一册。本书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Hu Suh, Feb. 1921。

2. *The Quest for Certaint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by John Dewey, New York: Minton, Balch & Company, 1929, 精装一册。本书扉页钤有“HU SHIH”蓝文印。

胡适藏书中，还有七种没有阅读痕迹、签名、印章的杜威著作：

1.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by John Dewey,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30, 精装一册。

2. *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 by John Dewey, New York: Minton, Balch & Company, 1931, 精装一册。

3. *How We Think*, by John Dewey, Boston, New York, Chicago, Atlanta, Dallas, San Francisco, Lond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33, 精装一册。本书封内有原书主签名：Virginia Davis Hortman, 7. 16. 42。

4. *Art as Experience*, by John Dewey, New York: Minton, Balch & Company, 1934, 精装一册。

5.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John Dewe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8, 精装一册。

6. *Education Today*, by John Dewe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40, 精装一册。

7. *Germa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by John Dewe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42, 精装一册。

本书扉页有周鲠生题记：送给适之兄即以祝寿，鲠生，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于纽约。本书胡适另有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5 年版，并有批注圈划，见前文。

另外，笔者还在胡适藏书中发现杜威赠送给胡适的图书四种，推荐胡适阅读的图书一种：

1. *Experience and Nature*, by John Dewey, Chicago : London :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25, 精装一册。扉页有胡适毛笔题记：杜威先生送我的。适。十四，四，二。

2. *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by John Dewe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38, 精装一册。本书书名页钤有“胡适”朱文长方印。扉页有胡适题记：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杜威先生七十九岁生日，他送我这一本新书。胡适。

3. *Science: The False Messiah*, by C. E. Ayres,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27, 精装一册。本书扉页有胡适题记：Gift of Dr. John Dewey, March 15, 1927. New York City. Hu Shih. 书内 41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书末有胡适注明的阅读日期：Jan. 2, 1928. 从胡适批注圈划看，本书虽非杜威著作，但胡适同样非常重视。

4. *With Malice Toward Some*, by Margaret Halse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38, 精装一册。本书扉页有题记：To Hu Shih, with love from Robby Lowitz and John Dewey. Robby Lowitz 曾任杜威秘书，后成为杜威夫人。

5.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The Lives and Opinions of the Great Philosophers*, by Will Duran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26, 精装一册。

本书扉页有胡适题记：Hu Shih, Jan. 12, 1927. New York.前年在英国，杜威先生来信称赞此书。去年一月十一日到纽约，席上与洛司尔院长同坐，他又对我盛称此书，故次日便买了此册。适之。书内60页有胡适批注圈划。此书可见胡适对杜威的推荐非常重视，买来之后做了认真的阅读。

以上各类与杜威有关图书共计32册，这在当时国内学者的私人藏书中鲜有匹敌，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胡适与杜威的交往，更可以看出杜威对胡适影响之大。胡适阅读杜威著作的圈划批注，留下了他的思考，留下了杜威对其影响的印记，也留下了他思想发展的轨迹，这些资料在胡适思想研究上，特别是对于杜威对胡适的影响的研究，应该是非常珍贵的一手资料。

后记：2010年6月，笔者曾以同样标题写成胡适藏书整理札记一篇，发表于《胡适研究通讯》2010年第3期，内容主要为对胡适藏书中与杜威有关的图书的介绍。2019年，应中国教育研究所储朝晖先生之邀，为参加纪念杜威来华一百周年研讨会而重写此篇。相对于初稿的材料性，本次重写稿对胡适主要阅读的杜威著作做了一定的梳理和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

[1] 郭湛波.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M]. 北平：人文书店，1935：369.

[2] 罗志田. 杜威对胡适的影响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117.

[3] 胡适.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M]//胡适. 胡适文选. 上海：亚东图书馆，1935：3.

[4] 唐德刚. 胡适口述自传 [M].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94.

[5] 胡适. 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卷 [M].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788.

[6] 胡适. 自序 [M]// 藏晖室札记. 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5.

[7] 胡适. 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卷 [M].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145.

[8] 胡适. 胡适全集：第23卷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85.

[9] 台北胡适纪念馆. 胡适档案资料库：胡适韦莲司专档. HS-CW01-004-006.

[10] 台北胡适纪念馆. 胡适档案资料库：胡适韦莲司专档. HS-CW01-004-007.

[11] 同[8].

[12] 胡适. 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卷 [M].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164.

[13] 胡适. 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卷 [M].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167.

[14] 胡适. 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卷 [M].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168.

[15] 胡适. 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卷 [M].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205.

[16] 胡适. 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卷 [M].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215.

[17] 胡适. 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卷 [M].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222.

[18] 胡适. 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卷 [M].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225.

[19]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档案馆. 胡适档案. E485-001.

[20]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档案馆. 胡适档案. E486-001.

[21] 胡适. 胡适日记全集：第三卷 [M].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161.

[22] 胡适. 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卷 [M].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9.

[23] 胡适. 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卷 [M].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34.

[24] 胡适. 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卷 [M].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716.

[25] 同上。

[26] 胡适. 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卷 [M].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719.

[27] 胡适. 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卷 [M].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718.

90年前：邹韬奋专访胡适

肖伊绯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的名号，无论是否熟悉其人其事，如今的读者大多也是知晓的。矗立于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的三联韬奋书店，一直就是北京乃至中国的文化地标之一，这里是读书人与爱书人的“朝圣”之地。对

于书店名中的“韬奋”二字，去过的人都有印象，也大都有一定了解。

胡适（1891—1962）的名号，知晓“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的读者，大多知晓，勿需多言。那么，邹韬奋与胡适之间的交往，究竟有何事迹

可圈可点，似乎并没有多少研究者关注过。究其原因，无非是胡适早年“暴得大名”，而邹韬奋则成名较晚，二人虽只相差4岁，可在生活境遇与事业路径上却差异颇大，看似没有太多的交集。

1926年10月，邹韬奋开始主持上海《生活》周刊编辑工作，终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他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并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而此时的胡适，正在环游英美各国，忙着讲学与考察，直至1927年5月归国，迅即又在上海与徐志摩等创办了新月书店。

1927年11月10日，邹韬奋向当时暂住上海的胡适写了一封信，一方面表达其敬重之意，另一方面也表示希望对其进行一次专访。（详参：《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黄山书社，1994）信文如下：

适之先生：

久切心仪，无缘识荆，至以为怅。为着《生活》周刊的事情，我很想和先生作几分钟的谈话。因知先生事忙，未敢冒昧。倘蒙见许，请告我一个时间。

《生活》周刊的读者好几次引起精神物质之争，我们想把大著《我们对于西洋与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在《生活》里转载一下，以饷读者，未知能蒙许否。祝你康健。

邹恩润上

十六、十一、十

一封短札，既要约谈，还要约稿，邹韬奋对胡适的推重，可谓溢于言表。不难看到，无论是出于个人思想立场上的契合，还是出于《生活》周刊办刊宗旨上的契合，主持刊物编辑未久的邹韬奋，对于专访胡适一事，都是郑重其事的。

事实上，早在邹氏致信胡适半年之前，《生活》周刊已经刊发过《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后的言论》（1927年6月26日），只不过，这是转发原载于《大陆报》的报道，还不是《生活》周刊的独家

报道。即便如此，转载刊发之后，读者反响热烈，也一度引发热议。因此，邹氏致信胡适请求专访一事，若能实施，则将是《生活》周刊的首篇“独家”报道，对刊物本身的发展自然是有着很好的推动力的。

1927年12月4日，《生活》周刊第三卷第五期印发。这一期刊物头版，醒目的刊载着“访问胡适之先生记”的标题；往后翻看，竟有足足三个整版的专访内容，且图文并茂，很是生动可观。专访报道，原文如下：

访问胡适之先生记

编者

中华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三点十分钟，编者为本刊访问胡适之先生于上海极司非而路“四十九号A”的寓所。后来和他握后，满怀的愉快，赶紧写出来告诉读者，不过文责当然还是编者自己负的。

预约

我先几天写一封信云约定晤谈时间，承他回信说：“我下午在家时多，极盼来谈，最好先打电话（西，六九一二）一问。”我在十六日下午便打一个电话给他，承他勤勤恳恳的指示怎样乘二路电车，到了静安寺路头，走几分钟走到“四十九号A”就到了，不过不是沿马路的，是要转弯到一个弄子里面云的。

曲径

我便照样的前往，很不容易的找到一个弄子，两边夹着西式的房屋，弄子宽而洁，曲而深：转了两三个湾，才走到“四十九号A”。上海本是一个喧嚣的地方，但是“四十九号A”却在这个“曲径”的末端，所以非常静寂。

静悄悄的西式小房子

到了“四十九号A”仰头一望，见是一所静悄悄的西式小房子，我伸手压了门上电铃，有一个身穿蓝土布长衫的“老家人”出来。我问胡先生在家吗？他说：“请你先给我一张片子，让我进去看一看。”我想这是受过相当训练的仆人，这

样一来，就是在家，也不妨把不愿见的人“挡驾”，尤其是遇有一种自己没有事却乘着别人忙的时候来瞎谈，谈了不够，还要像屁股上生了钉钉住了不去！倘若“尊纪”脱口先说了“在家在家”，你不好意思不见，那就不了！

我当时虽听了他的“闪烁之辞”，但是因为有了很稳妥的预约，老等着他出来开门。

万籁俱寂的书房

既而“老家人”果然出来开了门，引我上楼。我走进胡先生的书房，他正在万籁俱寂中执笔疾书，著他的《白话文学史》，见我来了，笑容可掬的立起握手，招呼我坐。随口告诉我说，这部书有四十万字，将由新月书店出版。这部书真可谓一部巨著了。

怕新闻记者！

我谈话的时候，从衣袋里拿出一本小簿子，抽出一支自来水笔，胡先生看了笑着说道：“你不要做新闻记者的样子！我看见这种新闻记者的样子，心里有点害怕！”我也大笑答道：“你不要害怕，我今天是专为《生活》来看你先生的，所以把要问的话，略为备了一点‘大纲’；一则可以有些系统，二则可以节省时间。”

对于本刊的意见我先把本刊的宗旨告诉他，并说你先生曾经说过，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本刊是要少发空论，多叙述有趣味有价值的事实，要请你加以切实的批评与指导。胡先生说：“《生活》周刊，我每期都看的。选材很精，办得非常之好。”说到这里，更郑重的申明：“我向来对于出版物是不肯轻易恭维的，这是实在的话。……我并听得许多人都称赏《生活》周刊。”

日本话

谈到这里，书房外面的电话铃响了。胡先生出去接谈，“叽哩咕啞”的讲了好几句，我听上去极觉得是日本话！心里想胡先生的日本话倒能说得这样熟极而流！我虽不懂日本话，但是曾经听见人说过，这个时候觉得一定不错。胡先生走进来，我就问他是不是说日本话，他笑着说是徽州话！我说倒和日本话很相似！后来我自己想起

一件关于自己的误会，我会说福州话，有一次在电话和一个人说了几句，旁边有一位朋友听了，赶紧问一句：“你说那一国的外国话？”我觉得我国方言的隔阂，也是文化进步上的一个障碍物。

求学时代

胡先生五岁至十四岁是在私塾时代。来上海后最初入梅溪小学，继入澄衷中学，由澄衷而中国公学。在中国公学时候，学生采用自治制度，共和精神，后因该校受端方的津贴，派监督来，取消共和制度，风潮遂起，学生愤而退出，组织中国新公学，当时公推朱经农先生任干事，胡先生那个时候担任英文教员。据他自己说，是教爱皮西底的初浅英文，倒也饶有趣味。这个新公学开了一年余，毕业过一班学生。随后他就留学美国七年，自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七年。

大困难

我问先生生平遇着什么大困难没有？他说：“我生平不觉得有什么大困难。说起来，将要留美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可算困难时候，那个时候差不多天天醉，醉了沿街打巡捕！”这样看来，留美一行，居然把一个“醉汉”变成一个哲学家和文学家，我们倒要谢谢美国。

家庭状况

我问先生的家庭是大家庭呢，还是小家庭？他说是小家庭。他的父母俱亡，三兄已故，他自己是“老四”。现有两位小少爷，一位小姐早殇。大的小少爷九岁，在北京本在孔德学校肄业，读了一年多法文，到上海后，因邻近一带没有什么好的小学，就友人家共请一位教读，除中文算学外，也读些英文玩玩。胡先生说“这个小孩子很好”。小的的小少爷六岁，就在家读读，请胡先生的书记教。这位书记每天不过来两三小时，帮帮抄写而已。那天胡太太已出门去看牙医去。谈话之间，上面说的那位“老家人”因事走进书房，胡先生指着他说：“这是我的厨子，也是我的仆人，一切由他包办，此外没有用老妈子。”……“我家里真静得舒服，像今天胡太太和几个小孩子出去看医生，家里就只有我和他。”

现在的日常生活

我问先生现在每日做什么事？他说每星期在光华大学教授三小时，在东吴法科大学教授三小时，这两个地方每星期里就费了他四个上午。此外都在家里著书。我问每天大概著多少字？他说“不一定，像前几天的四天里面，连做三篇序，都很长，每日约三千字至六千字。昨天便玩了一天。”我觉得这种生活倒也舒服，著作得起劲的时候，就做；做得吃力高兴歇歇，就玩个一天。但是这也看各人所处的情境，不能一概论的。

星期日的特别生活

我问先生星期日也休息吗？他说星期日反而大忙。我问忙些什么，他说星期日宾客来往不绝，其中有和尚，有军人，有学生，有艺术家。……形形色色，忙得不了。所以胡太太常笑他说，星期日好像大做其礼拜！星期日偶遇没有宾客的时候，他还是照常著书。

娱乐

我问先生于著书之外，也有什么其他的娱乐吗？他说时间差不多全用于著书，非有人拉他去玩，简直不想别的什么娱乐。编者自己除爱看影戏外，近来又加了一种娱乐，就是喜欢跳舞。近来居然于星期日傍晚常到大华饭店去加入大跳而特跳。我便随口问胡先生喜看影戏吗？他说好几年没有看影戏。我又问喜欢跳舞吗？他说：“跳舞我是很喜欢学的，但是没有机会学会，现在年纪大，学不好了。”其实胡先生今年还不过三十七岁（胡太太比他大一岁）。我看他只认定著书是他的唯一娱乐。

北京

我问胡先生还有到北京去的意思吗？他说他很喜欢北京的气候，不过目前或有久居上海之意。上海书不够看，他正在设法把藏在北京的书搬出来。我问先生和北京大学还有关系吗？他说前年作欧游的时候，便与北京大学脱离关系了。

对于中国的观察

后问先生对于中国前途的观察，有何意见发

表。他笑着说道：“我不谈政治。”我说撇开政治而谈社会，我觉得近年来我国社会在思想方面确有进步，你以为如何？他说：“近年来我国社会确有进步。只要有五年的和平，中国便大有可为。”

本分人物

我说各国在思想界总有一二中心人物，我希望胡先生在我国也做一位中心人物。他说：“我不要做大人物。”我进一步问他：“那末要做什么人物？”他说：“要做本分人物，极力发展自己的长处，避免自己的短处。……各行其是，各尽所能，是真正的救国。”

努力

我这次费了胡先生三刻钟，承他临时替《生活》周刊写了一张古的新诗（即本期所刊墨迹），最后我问他讨了一张本身相片和一张家庭相片，兴辞而别。握别的时候，胡先生还说他很佩服《生活》周刊的努力精神。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晚十一时记。

上述这篇专访报道，虽篇幅不小，但严格说来，并无十分明确的采访主题，更像是邹、胡二人初晤时的闲聊。从初见寒暄与相互介绍，到胡适略述生平、近况与见解，整个专访过程，轻松适意，友好亲切。当然，与此相应的，也并没有抛出什么特别令人瞩目的“看点”，并不是那种刻意要引发关注的专访报道。毕竟，读者通过此次专访报道，一方面邹氏完成了“久切心仪，无缘识荆”的心愿，与胡适终得初晤；一方面也让读者可以了解到当时已经声名远播的胡适的生平与近况，这已经算是圆满的结果了。

值得一提的是，报道中所附胡适肖像照片，应当是胡适本人比较喜爱的“标准照”。当时，胡适赠送友朋的个人照片，多取用这一张。直至1935年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杂志编印《二十今人志》时，选取的胡适肖像照片，仍是这一张。如今收藏在台北胡适纪念馆的一张“同款”但身姿略有不同的胡适照片，据称摄于1925年，基本

可以推断，刊于《生活》周刊上的这张胡适照片，应当也摄于1925年。

此外，报道中所附胡适的家庭照片，为其夫人与两位幼子及侄儿的合影，也难得一见（尚未见载于同时期其它刊物），对研究胡适生平与家世有参考价值。至于那一幅胡适手书的“新的古诗”，乃是初唐王梵志的诗；因其为禅僧，喜用白话作诗，正合胡适所推崇的“白话文学”旨趣。所以，胡适手书一幅赠刊，以示表彰“白话文学”之意。额外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首古诗，胡适生前非常喜爱，曾题写过多次，用于赠送友人。后来，胡适于1934年开始，发愿从中国古诗中选注

“每天一首诗”，期望从中甄选出文词简明又品格高超的好诗。胡适历时18年之久，中间经过多次增删，至1952年时选定了105首（1960年在台湾修订完稿），而王梵志此诗列于首位。不难揣想，胡适题赠《生活》周刊的这一首王梵志诗，可能乃是其首次挥毫落笔，向公众“荐诗”的首发之作罢。

遥思90年前，当年购阅《生活》周刊的读者，既看到了独家专访的大篇幅内容，又看到了胡适“本尊”真容及其家庭成员，还能欣赏到胡适书法与“荐诗”，应当是颇觉新奇与快慰的吧。

重读人生与时代的多个“版本”

——胡适自传版本新考

肖伊绯

按：五年前，2015年，拙编《胡适的自传（中英文汇校本）》，曾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印行。当时，曾草撰一篇《胡适自传版本考》，付之弃首。是书出版后，笔者又有幸寓目胡适自传版本多种，深感有重新修订之必要。为此，修订原稿，撰成此篇。相信随着新见史料及文献的涌现，此篇虽曰“新考”，也终会成为“旧见”，还会有进一步修订增补的空间。谨在此“抛砖引玉”，先行求教于海内方家及广大读者。

胡适生前，由其本人所撰自传《四十自述》，作为民国时代的著名自传之一，风行海内，流传已久。可以看到，这本自传自单行本出版问世以来，迄今为止，已经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再版、重印、增订多次，还有在日本、德国出版的译本。仅就胡适生前出版过的版本考察，至少已有七种之多——即《四十自述》英文版（What I Believe）、《新月》连载版、《四十自述》亚东版、《四十自述》日文版、《四十自述》德文版、《四十自述》自由中国版（即六艺版和远东版）及新近发现的《四十自述》华侨版（以下均简称“XX版”）。

◎《四十自述》“亚东版”细节

实际上，“连载版”与“亚东版”是一脉相

承的中文版本序列，《四十自述》正是在这一序列中逐渐成形，并最终成为“定本”的。众所周知，《四十自述》是胡适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陆续写成的，从1930年6月动笔，胡适在上海完成两篇文章，迁居北平后至1932年9月，陆续写完留学前的一段生活，又有四篇文章完稿；这六篇文章就都陆续发表在《新月》杂志。1933年9月，这六篇文章又统一交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单行本，即《四十自述》最通行的“定本”，被称为“亚东版”。

“亚东版”在1949年之前多次再版，颇受读者推崇，但究竟再版过多少次，由于版本存世有限，目前尚无定论。仅就笔者目前所见，至少出版过八次之多；其间也还有微妙的版本差异。

笔者曾见到过1933年9月初版的“亚东版”，

当年10月即再版，1935年8月第三版、1937年2月第四版、1939年1月第五版、1940年6月第六版、1941年1月第七版、1947年6月第八版。从第四版起，书的封面题字一改先前的胡适自题隶书，而代之以钱玄同所书隶书。（事实上，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书店影印《四十自述》，所用的底本正是这第五版的“亚东版”，而没有采用初版本。）据这些出版信息可知，《四十自述》一书当年的印量与销量皆是可观的，其影响力应当是持续且广泛的。

以“亚东版”为底本，1940年3月，由日本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翻译的日文版《四十自述》，作为“创元支那丛书”之一种出版。1946年12月，吉川译本被冠以《胡适自传》的书名，作为“养德丛书”之一种出版。

◎《四十自述》“自由中国版”始末

1954年2月，暂寓美国的胡适，离开纽约，飞抵台北。此行专为出席“国大”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胡适抽暇整理了《四十自述》，并加入一篇《逼上梁山》作为附录，拟在台湾出版一部“新版”的《四十自述》。为此，他专门拟写了一篇“新版”自记，这就是后来所谓“自由中国版”自记。

自记不长，但很有意味。从胡适这篇自记来看，“新版”的《四十自述》并非从一开始就要交由台湾的远东图书公司出版。自记中提到敦促他出版此书的友人卢逮曾，原是北大文学院秘书兼文科研究所秘书，抗战期间还曾主持重庆独立出版社事务，迁台后更任独立出版社总经理。无论从交谊还是便利而言，“新版”的《四十自述》都理应交由独立出版社来出版；但胡适既然自称这个“新版”为“自由中国版”，则可以此揣测，胡适是想将其交由《自由中国》杂志社来出版，或者是冠以《自由中国》杂志社的丛书名义，再交由独立出版社来印制发行。可惜，事与愿违，命运不作美。胡适在“国大”期间的政治主张与建言并未获得采纳，旋即于当年4月5日即离台赴美。所谓“自由中国版”《四十自述》

的出版计划，也就只能暂时搁置了起来。

迄今为止，就笔者所知，按照胡适“自由中国版”设想编排出版的《四十自述》，台湾远东图书公司承印的最早版本为1956年第1版，即“远东版”初版。实际上，台北六艺出版社则早在1954年3月，就已经出版了附有“自由中国版自记”的《四十自述》。只是这一版本流传不广，不易觅得，少为人知；而“远东版”则流传广泛，多次再版发行，台湾读者对这一版本更为熟悉。

◎《四十自述》“华侨版”疑案

殊不知，在“远东版”与“六艺版”印行之间的这段时间里，香港还出现过一种“华侨版”《四十自述》。新近发现的“华侨版”《四十自述》出版时间，较“远东版”为早，较“六艺版”只晚3个月时间；且胡适为之专作“华侨版自记”，无形中又为这一自传平添另一版本。

“华侨版自记”作于1954年5月26日，略晚于“自由中国版自记”的落款日期，且此时胡适已身在美国。从整篇自记来看，显然就是在“自由中国版自记”的基础上略加改写而成。比较明显的差异只是在最后一段强调了这本书面向的读者乃是海外华侨。这段话原文如下：

因为海外许多朋友，劝我把“四十自述”六篇排印出版，加上“逼上梁山”一篇，仍题作“四十自述”。他们的好意，使这几篇试写的自传剧然有一部华侨版，我把这一部海外华侨版的“四十自述”献给海外的青年朋友们。

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五月廿六日夜
胡适记于美国

“华侨版”与“远东版”，从封面上看颇为相似，皆是胡适以楷书自题的大字。稍有区别的是，“远东版”在封面左上侧印有“胡适著”字样，右下侧印有“远东图书公司印行”字样，书名的题字一侧并没有胡适的落款。而“华侨版”的封面则著者与出版社名目皆无，完全只是带胡适落款及印章的题字展示而已。此外，“华侨版”的封面有底纹，印有暗绿色群龙图样；而“远东

版”的封面则为浅粉色，底纹不明显。

“华侨版”在版权页上明确注明“**一九五四年六月港版**”，可以确定，比目前最为流行、最易读到的“远东版”初版时间（1956）还早两年。版权页上还注明，出版者为世界文摘出版社，承印者为香港南洋印刷厂，经售者则为香港及南洋各大书店等等，从这些信息来看，“华侨版”的出版发行的确是针对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广大华侨群体的。

“华侨版”与“远东版”均在内页配图上有了变化，都把原用胡适中年照片的“四十岁的著者”配图，替换为“著者近影”配图——所使用的胡适晚年照片，也是在胡适生前出版物中见到的，可能是胡适本人最晚拍摄的照片（据说为郎静山所摄）。然而，“一九五四年六月港版”的“华侨版”虽确在目录页上标有插图三幅，正文部分中却没有插图配置，也即是说是纯文字版本，书中并无任何图版。“华侨版”另有一种稍晚的再版本，即“**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港版**”，这一版本中的插图则配置齐全，与初版在装印上也有一定区别。如封面采用了钱玄同题笺的旧式，但在左下侧加印了一行“香港光华书店发行”的字样；又如用红色铅字修正了原“华侨版”中的一些讹误等等。

此外，“华侨版”还有一种可能是非法翻印的版本，这一版本没有版权页，没有售价，没有插图，只在末页上印有“**显藏出版社，香港九龙弥敦道九九九号**”字样。通过查证相关资料，在香港的近代出版史上并没有“显藏出版社”这一名目，且弥敦道的门牌号也从未设置到九九九号。可以揣测，这可能是一家在香港不知名的“地下出版社”，其出版物可能还是未经官方机构审核的非法出版物。实际上，无论是世界文摘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还是由于子虚乌有的显藏出版社所翻印的非法出版物，如今都并不多见了。

◎楔子：《四十自述》的英文版“前传”

与新近发现的“华侨版”《四十自述》相似，胡适的这部自传还有一部英文版的“前传”，也

久为人们所忽略，几至湮没无闻。其实，早在《新月》连载版、亚东版之前，胡适已经用英文撰写过自传，并在美国纽约发表过了。

原来，胡适于1931年1月、2月，就在美国的《论坛》（Forum）杂志上发表了“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一文，连载两期。这篇文章虽然从题目上看，是谈个人信仰问题，但胡适却将其家庭背景、生活历程、人生理想予以充分剖析与阐论，文章很多内容都与《四十自述》或基本吻合或有所呼应，无异于《四十自述》的“前传”。

可以看到，这本1931年的美国杂志上，在胡适文章题目下还标有“生活哲学第16”（Living Philosophies XVI）的字样。这实际上是杂志开辟的一个“生活哲学”专栏，而“我的信仰”是这个专栏的固定专题，胡适是为这个专栏撰稿的第16位作者。在胡适之前的撰稿人大多声名显赫，皆是国际知名的哲学家、科学家等著名人物，诸如第1位撰稿人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第2位撰稿人是英国哲学家罗素，第3位撰稿人美国哲学家杜威（胡适之师）等等；该杂志对撰稿人的挑选显然考虑了国际知名度因素。作为第16位入选的特约撰稿人胡适，杂志对其也有一个标笺式评价——“中国复兴之父”（father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显然，这是对胡适大力倡导并阐扬，一直践行并坚守的“中国文艺复兴”理念的一种肯定。

胡适的文章分为十大章节，分别阐述了胡适的父亲事迹、父母的婚姻、母亲的抚育与影响、早年生活忆述、早年求学经历、接受进化论思想、在美国的学业与理想、留美七年的思想进化、母亲之死与不朽观念、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等内容。在这十大章节的内容中，胡适的家世背景、父母事迹、人生理想、信奉理念及生活感悟等内容均自然而然的得以流露与表达，将其四十年的人生轨迹予以了生动刻划。

此文发表后不久，美国哲学家约瑟夫·伍德·克勒奇（Joseph Wood Krutch）、欧文·埃德

曼(Irwin Edman)等6位知名学者又应邀撰写该专栏。1931年7月,美国纽约的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Simon and Schuster)将《论坛》杂志“生活哲学”专栏文章一并结集出版,书名就叫做《生活哲学》(Living Philosophies)。此书将共计22位国际知名学者,已发表的“我的信仰”专栏文章集中展示出来,并为每位学者配置肖像插图。是书装帧精美,黑色仿皮精装,书名烫金,内页采用重磅道林纸精印,学者肖像插图均为单页铜版纸印制;并特制有部分专供收藏的毛边本。此书一经出版,迅即在美国引发轰动,无论政要名流,还是普通读者,均购藏踊跃。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所插配的胡适照片,与当年胡适题赠给康奈尔大学地质学教授亨利·韦莲司的夫人的那张照片极其相似,这张照片应当就是胡适1927年在美国纽约拍摄的一组照片之一。这一年的1月12日,胡适赴美,抵达纽约。2月4日,胡适赴哥伦比亚大学作讲演,并在此完成其取得该校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手续。从照片上看,时年36岁的胡适,西装笔挺、衬衫领带整洁如新,圆框眼镜中的双眼炯炯有神,俨然是一位颇具绅士风度的新派文人模样。正式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胡适,在这张照片中所流露出来的愉悦与自信,其英气逼人的仪态与风度,也一定让当时的读者过目难忘罢。

1941年,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世界出版公司(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得到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授权,重新出版了《生活哲学》的修订版。除了删去第22篇文章,即英国遗传学家、最早提出“克隆”概念的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J. B. S. Haldane)所撰文章之外,其余内容,一仍其旧。可能是由于战时经济紧张、物资短缺的缘故,这个“修订版”的开本、装帧、用纸等各个方面,都不如1931年的初版本那么理想,更将原有22张铜版纸印制的作者肖像全部删除,大大的降低了印制成本。但这一版本在当时仍然相当受读者欢迎,1941、1942、1943年,连续三年都有加印再版。

◎未授权的中译本:《我的信仰》

在中国国内,最早接触到胡适这篇英文版自传的赵家璧(1908—1997),以几乎与美国杂志同步的速度,在其主编的《中国学生》杂志上发表了由向真翻译的中文版。1931年2月—4月,《中国学生》杂志第3卷2期、3期、4期,以三期连载的方式,将胡适《我的信仰》翻译为中文,全部发表。

在未经过胡适本人授权,也未交由胡适本人校订的情况下,赵家璧对这样的“超常规”做法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在《编者的话》中写道:

“胡适博士的《四十自述》在《新月》上开始发表后,我们对于这位中国文学革命的前锋,其所以产生如此思想的背景,得了个坦白的供状……我国白话运动的主将,中国生存的哲学家,这次能自己动笔,写他自己的传记和信仰,却是中国文坛上的创举。”

接着他介绍说:

“美国Forum(论坛)杂志有H. G. WELLS(韦尔斯)、胡适等十四篇题目都是《我的信仰》,然而写法不同的文章。胡博士的,便用传记体夹写他自己思想的演进。据胡博士告诉人,说这篇东西,是特别为了写给既不熟悉中国的国情,而对于他的思想又很隔膜的异邦人看的……”

最后,他郑重声明:因为“须赶在二月号上发表,故请向真君翻译后,未能如愿地请原作者去修正一下。所有遗误之点,完全由本志负责。”

胡适对赵家璧的译介,虽未置可否,也并未有过任何追究责任的意思。事实上,正是在胡适的大度默许之下,《我的信仰》中文版得以在国内迅速传播开来。1931年9月,由赵家璧主编的《一角丛书》问世,这是一种64开的袖珍小丛书,售价每本一角,内容包罗国内外政治、经济等知识性选题,兼及小说、散文、传记等,都是简短精到之作,是一套很受欢迎、影响深远的通俗读

物。这套丛书的第一本名为《今日四大思想家信仰之自述》，正是胡适、韦尔斯、爱因斯坦、杜威在《论坛》杂志中所撰“我的信仰”专栏文章，被逐一转译为中文，结集而成。

在“篇前”语中，赵家璧不但提到了 Forum 杂志，还提到了《生活哲学》（Living Philosophies）一书。他写道：“这里发表了四篇信仰以后，接着还预备介绍……将来把其余的完全翻译了，读者便可获得一部‘当代哲学’（Living Philosophies 是美国书店把‘我的信仰’汇集重印的一部新书，最近在纽约出版，每册售价美金五元。）的全译本。”由此可见，向真译本不但第一时间参照了 Forum 杂志连载文章，还有可能用《生活哲学》（Living Philosophies）一书中的汇编文章校对过，的确算是国内比较完善的译本。

至于赵将“Living Philosophies”的书名译为《当代哲学》，则又与胡适在日记中译称的《生活哲学》不同。原书确实选有不少当代哲学家或者富于哲思的作者所撰文章，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入选作者并不是哲学家，其中科学家、文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比比皆是，他们所撰文章与“当代哲学”毫无关涉，所以仅凭书名英文的字面意思直译，是不够妥当与确切的。而作为是书入选者胡适自定的中译书名，则较为充分完善的表达了原书主旨，即此书所有入选作者所撰文章，均在集中表达作者自己的生活历程与生活理念——生活哲学。

显然，应当遵从原作者、入选此书的胡适本人所认可的译名，而不应仅据中译者的意见，便认定中译书名。如今胡适研究者中亦有依从赵译书名《当代哲学》者，是不够准确、不太妥当的，这是在中译本之外没有认真翻检英文原版与《胡适日记》造成的误认。

从《今日四大思想家信仰之自述》的印行来看，这本小册子从1931年8月10日付排，9月4日即初版面市；当年10月即再版，12月第3版；1932年5月第4版、9月已第5版；印量达到了7000册，还是比较受读者受欢迎的。1935年，经

纬书局编印的《现代百科全书》第三册《时人自述与人物评传》中，又收入了胡适的这篇“我的信仰”，仍是原封不动的向真译本。

又据1931年2月27日，刘大杰（1904—1977）致胡适的信，信中也提到了《我的信仰》的翻译问题，并且还敏锐的意识到，这部英文“前传”与《四十自述》之间的转译关系。信中写道：

“你在 Forum[论坛]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有一个人译了一份寄给我了，想在《现代学生》上登载。但是那篇文章，我在杂志上看了前半，觉得与《新月》上的第一章‘自传’很相同，可是后半，我今天才有机会读到，倒有些新鲜的地方（如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之类）。你觉得这篇文章还有译给中国人看的必要没有？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的话，我想就不登他。”

投寄译稿给刘大杰的，应当是较早接触到 Forum 杂志的译者，几与译者向真同步。但《现代学生》后来没有刊载过《我的信仰》之译文，或许只是刘氏自己觉得，这部英文“前传”与胡适《四十自述》的内容太过接近，没有再重复刊载的必要了罢。刘大杰收到的这份译本，究竟谁是译者；胡适对这一译本又持何种态度，由于没有更进一步的物证，至今无从查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信仰》除了向真译本之外，当年还有一份明耀五译本，这份译本曾经保存于胡适手中。在1931年6月16日，章衣萍致胡适的信中提到：

“友人明耀五君现将先生所作 What I believe 译成中文，该稿已由大东收买，作为《英汉对译丛刊》之一。译文由衣萍代看过一次，略改数处。惟间有疑问之处，如文内所引太白诗及 Browning 诗等，非得先生亲笔校改不可，现由邮挂号寄上，请先生拨冗一改，无任感荷。”

信中提到的明耀五，曾任《中国学生》月刊

的主编，而当时赵家璧任助编；1929年1月，《中国学生》月刊创刊，第二期他即辞职，赵遂任主编（详见赵家璧《编辑忆旧》）。后来他还曾任上海《世界军情画报》主编，1932年其译作《甘地自传》经由大东书局出版发行。特别有意思的是，就在赵家璧主持的“一角丛书”中，第四种即是明耀五所译《生命知识一瞥》。看来，明、赵二人不但是曾经的同事关系，后来也还有过合作关系。也由此可知，在向真之后，直接据美国 Forum 杂志为底本的中译者，还有明耀五和参与校改的章衣萍。只不过他们更为细致认真，并致函告知了胡适本人，希望能经由其亲自校定后再行出版。

由于目前没有看到胡适致章氏的回函，也就无法确证胡适是否曾经校定过或授权此译本的正式出版。事实上，在胡适1949年离京赴美之后，所遗留在北京的私人文档中，明耀五译本也在其中。这一译本从内容上来看，与向真译本大同小异，译文中一些明显的疏误，也并没有更进一步的校正，后来也未能得以付诸出版。

无论如何，向真译本在民国时期，一直都是最先译出也是最为通行的版本。然而，由于《今日四大思想家信仰之自述》原书流传至今已渐趋稀少，不易觅得，有相当多的胡适研究者转而以《时人自述与人物评传》中的向真译本来替代。但不知何故，却又认定这是采用的明耀五译本，在论文注释中，往往又将这种误认再一次确定下来；因此给普通读者造成《我的信仰》最为通行的译本为明耀五译本的假象。这显然是没有亲自检阅多种民国出版物，没有追溯最初版本所造成的常识性错误。

◎《四十自述》后传：Living philosophies, revised

当胡适英文版自传的未授权中译本，开始在国内流行开来之际，美国书评权威、书评家克里夫顿·费迪曼（Clifton Fadiman），借着《生活哲学》一书方兴未艾之势，于1939年又推出了一部仍是名流文章荟萃的《我相信》一书；书的副题

点明了此书的主旨与亮点——我们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之生活哲学（I believe: the personal philosophies of certain eminent men and women of our time）。

此书特意邀请了一大批新的国际知名人物撰写专文，更新增一些文学、文艺领域的知名人士稿件；诸如英国诗人奥登、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英国小说家福斯特等，中国名人方面更有林语堂入选。此书共辑入21位“新作者”的文章。

在编选稿件方面，此书不但“新意”迭出，也兼有回顾性质；在1931年《生活哲学》中收录有文章的部分作者也在征稿之列。包括胡适在内，仍有一小部分“旧作者”对此予以了回应，但主要是针对《生活哲学》中的“旧文章”予以修订及补充说明。“旧作者”共有17位，爱因斯坦、杜威、罗素、胡适等都赫然在列。这样一来，此书新旧作者共计达38位之多。

在《我相信》一书中，为这部分内容专辟一栏“生活哲学之修订”（Living philosophies, revised）。在撰写《我的信仰》、《四十自述》之后十年，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等一系列国内重大变局之后，正在经历全民抗战、时任国民政府全权驻美大使的胡适，此刻感慨万千的为“生活哲学之修订”撰写专文。

时年48岁的胡适，开篇即接连发出三个疑问——**我现在怎样去评价自己十年前的生活哲学？我会对此感到不满意吗？或者这才正是认识自我、回归自我的一次成熟历程？**接下来，胡适并没有直接回答上述三个疑问，而是极其凝重的写道——**无须多言，过去的十年，对我个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都是极其悲壮的十年。**

可以看到，在这篇对《我的信仰》有所“修订”的，堪称《四十自述》“后传”、《五十自述》“前言”的英文文章中，胡适的家国情怀更加浓烈与突显，而不再是纯粹的个人陈述与自我表达。此刻，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力图说服并推动美国参与太平洋战争，成为胡适这篇文章的主要诉求。在文章的最后，胡

适仍然用一句反问结束全文，他说，**当我们被号召去为亿万人谋求生命与福祉之时，我们怎能对此无动于衷？**为抗战苦苦寻求国际援助的胡适，在这篇原本应是个人陈述居多的文章中，却一次又一次的叙述着中国人正在经历的苦难与伤痛。作为同时代精英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胡适，那份共赴国难的苦心孤诣与精诚所至，在这篇文章中一次又一次强烈的流露出来。

1941年3月，上海长风书店编印的“青年丛书”中辑有《我的信仰》一书，是书收录了胡适的这篇文章，译者为应远涛、袁访赉（译文有删减）；是书还相应增入了林语堂等“新作者”的文章，共计19位作者的文章。其内容恰恰是《我相信》一书38位作者文章的半数，显然，这是一本为迎合中国读者特意印制的摘译本。此书尚有1946年10月的再版本，内容与初版本一致，无改动。

◎《四十自述》英文注释本：

My Mother's Betrothal

1946年2月，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将胡适《四十自述》中的“我的母亲的订婚”一章，单独抽出，冠以“My Mother's Betrothal”之名，印制了一册附有英文注释的教材。之所以要印制这样一册“特别”教材，是专供校内学生学习中文之用的，并不公开发售。选编者Mary Rouse的初衷，是认为胡适的语言符合现代中文的特点——简练、清楚、明白，且特别适宜于外国人学习，所以特别从其自传中抽取出一章，加以英文注释，对照着中文原文，便于学生学习与理解。

“我的母亲的订婚”这一章，被认为是既能体现胡适语言特点，又能初步了解一些中国风俗；可能还因为胡适抗战期间曾任驻美大使，美国民众对他也比较熟悉的缘故，因之被选用。

作为抗战胜利后，《四十自述》的首部英文注释本，My Mother's Betrothal无疑也有着其独特的历史价值。虽然二战期间的美国人，早已熟悉这位书生大使的众多演讲名篇，“What I believe”一文也早就为人们所熟知，但由美国的

大学院直接以胡适的中文文本加以英文注释，这还是第一次。虽然耶鲁大学的编译者，更看重从语法结构、中国文史等方面去研究和学习胡适的文笔，但这无疑又再一次增进了胡适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好感度。这位“中国现代文艺复兴之父”的生平与抱负，也因之得以再一次在非华语世界展现。

◎重读胡适自传

八十年后的今天，后世读者不妨设想，如果将胡适的英文版自传《我的信仰》，与中文版自传《四十自述》，以及英文版《生活哲学之修订》的内容捏合在一起，再逐一加以研读，那将是怎样的一番别样况味，那将是怎样的一番心灵触动？

遗憾的是，虽然此后数十年间，《四十自述》作为胡适自传的唯一“定本”，屡屡被研究者提到或征引；却鲜有言及英文版《我的信仰》者。即或在某些胡适选集、文集中偶有征引《我的信仰》中译本者，却绝无英文版原文（以及完整的中译本）可供研究者、读者参考；而英文版《生活哲学之修订》则更是几乎被完全遗忘了。

经多年搜求，笔者有幸获见上述诸种英文原版旧著数部，以及“亚东版”以来的中文版《四十自述》数种，逐渐厘清了一些胡适研究领域中文焉不详、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的版本问题。正是在这一发现与再发现的历程中，笔者发意编印“汇校本”《四十自述》的计划，方才有了可以实施的文献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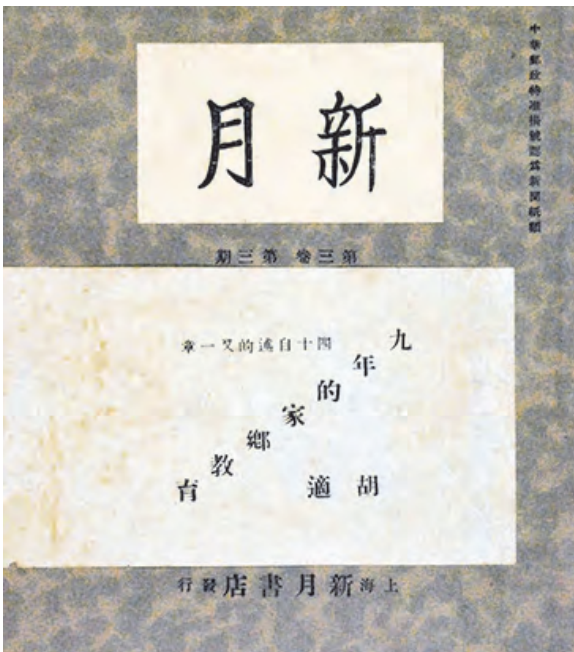
重读胡适，能读出多少新意，能读出多少深意，实在无法确知。但后世研究者与读者可以尽力做到的乃是，使用最接近于著者本义的原始文献，或列举有相当规模、经过缜密甄别的原始样本，还原有品质的文本细节与时代语境；并进一步详加注释考订，进一步充分辨析理解。或许，重读胡适，就是重读人生与时代的多个“版本”，并从这些“版本”差异的细枝末节中去各各品鉴、各各体悟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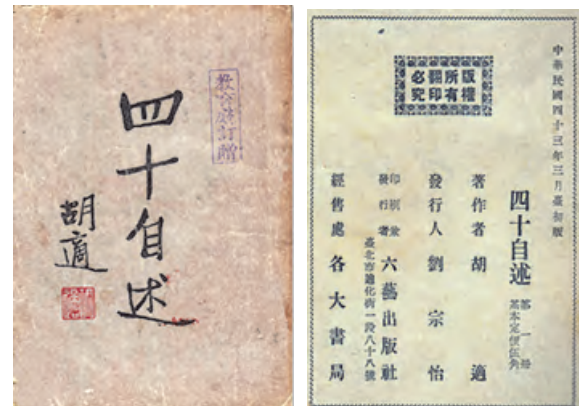
《四十自述》手稿



民国“亚东版”《四十自述》，1939年1月五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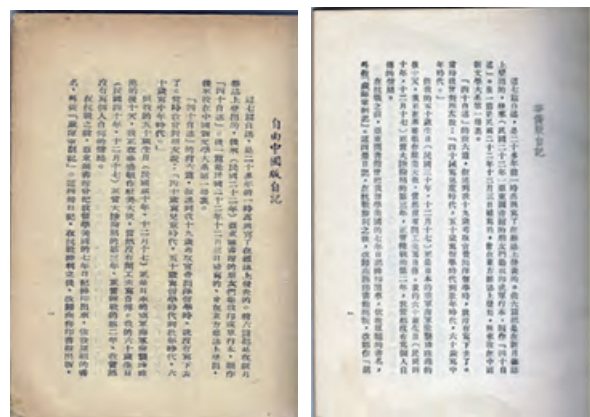
最早连载《四十自述》的《新月》杂志。



台湾“六艺版”《四十自述》，“自由中国版自记”最早印行者，1954年3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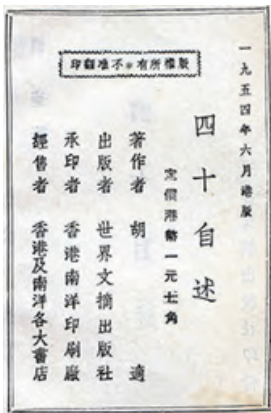


民国“亚东版”《四十自述》，1933年9月初版。



(左) 台湾“六艺版”《四十自述》，所附“自由中国版自记”。

(右) 香港“华侨版”《四十自述》，所“华侨版自记”。



香港“华侨版”《四十自述》，1954年6月世界文摘出版社出版。



日文版《四十自述》，吉川幸次郎译，1940年3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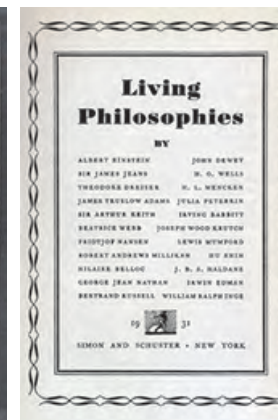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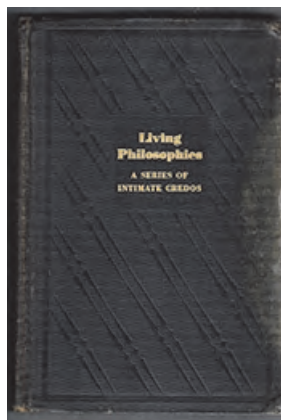
香港“华侨版”《四十自述》，1957年11月世界文摘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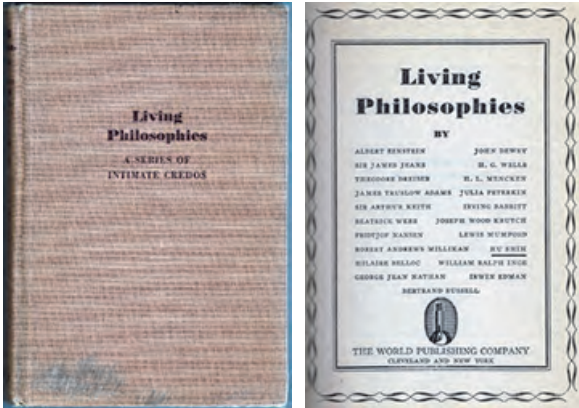
美国《论坛》(Forum)杂志，胡适“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版面，1931年1、2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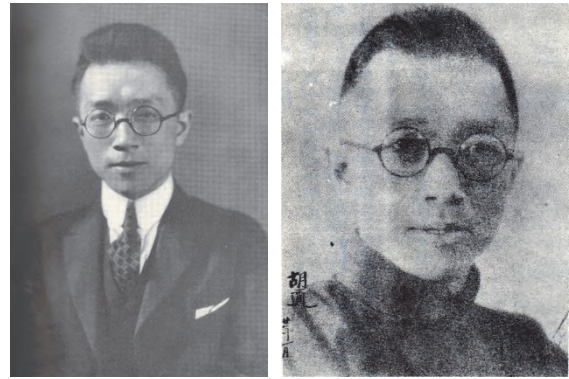
(左)台湾“远东版”《四十自述》，1956年初版。
(右)香港“华侨版”《四十自述》之一种，可能为“地下出版物”。



《生活哲学》初版本，刊胡适“我的信仰”；1931年7月，美国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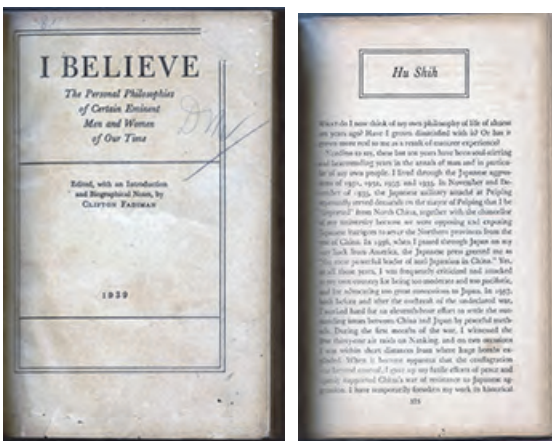


《生活哲学》修订再版本，刊胡适“我的信仰”；1943 年，美国世界出版公司出版。



（左）《生活哲学》初版本所附照片，胡适 1927 年摄于美国纽约。

（右）《四十自述》“亚东版”中所附胡适四十岁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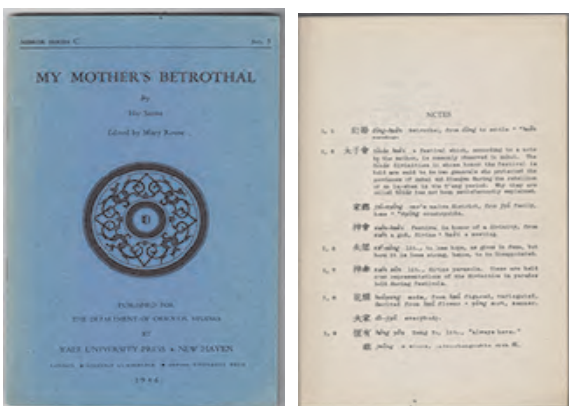


美国书评家克里夫顿·费迪曼编印的《我相信》一书，刊胡适“Living philosophies revised”；1939 年初版，上海现代图书公司经售。



（左）台湾“六艺版”《四十自述》所附，“著者近影”之胡适晚年存照。

（右）香港“华侨版”《四十自述》所附，“著者近影”之胡适晚年存照



胡适《四十自述》注释本：My Mother's Betrothal, 1946 年美国耶鲁大学初版。

胡适先生的加拿大轶事

桑宜川

现代中国著名学者胡适先生一生堪称传奇，驰骋于史学、文学、哲学诸多领域，著作等身，彪炳史册。他在美国度过了近27年的光阴，一生几次途经加拿大，参会或观光，足迹遍及诸省。抗战时期，他还应邀到访加拿大的几个城市，发表演说，呼吁加拿大政府与学界声援与支持中国抗战。他还分别接受过麦吉尔大学颁发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和多伦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在加拿大留下了许多文字及墨宝，早已尘封在历史的碎片里，如今史海钩沉，重新打捞出来，整理成篇，但因篇幅所限，谨此举隅，以飨读者之朵颐。

近年来，海内外的胡适研究已成为显学，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汗牛充栋，成果累累。然而在这一研究领域，鲜有涉及胡适在加拿大留下的足迹及轶事，偶有叙述，多为片言只语。当然，这也归因于年代久远，史料极为匮乏。其实，胡适的早期人生轶事并非付诸阙如，散见于他的日记，信札以及当年同辈学者及友人回忆录里，尤其是他的历次加拿大之行，均有详细记载。通过比勘不同版本的历史叙事，或可澄清以往关于胡适修身进德的许多误读。

胡适日记里的落基山风光

如今可查阅的史料记载，胡适第一次登陆加拿大，是在1917年6月20日。彼时，他已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博士学业，乘火车从纽约抵达温哥华，准备于次日在二埠（今新西敏市）菲沙河码头乘日本皇后号回国。之前他在5月22日通过他的博士论文答辩，29日便向美国哲学家、恩师杜威辞行，踏上回国之行。那一次是途经加拿大，预订的船票是6月21日。

关于这次旅程见闻，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十九日晨起，火车已入加拿大之落基山。落基山贯

穿合众国及加拿大。吾来时仅见南段之山，今去此乃见北段耳。落基 Rocky 者，山石萃确之意。其高峰皆石峰无土，不生树木。山巅积雪，终古不化。风景绝佳。所附诸图，仅见其百一而已。”这是一段生动的风光描写，由此“吾来时，今去此”一句可推断，胡适在这之前，1910年赴美留学途中，也曾取道温哥华。

在胡适笔下，落基山脉在加拿大一段的风景比在美国的那一段的景致好得多，应是不虚之言。大凡去过的游客应有此体会，森林植被，雪山峡谷，湖泊冰川主要集中在加拿大这一边，横贯东西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长达近五万公里，其中最为险峻的路段，穿越这些景区，由华工修建，功垂史册。除此而外，胡适日记里还有描述：“尼亚加拉大瀑布，从加国这边眺望，视野开阔，景致更为壮美。”这一句佐证了他也曾到过多伦多远郊的美加边境，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前辈学问大家如此抒情感怀，令笔者顿生一种历史沧桑感，江山岁岁依旧在，斯人不知在何方？

胡适与加拿大班夫会议

回望历史，1933年8月14日至28日，太平洋国际学会（The Institute of the Pacific Relations）第五次年会在加拿大的班芙（Banff）举行。其时，胡适是代表团团长。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陈衡哲女士，她是新文化运动初期最早从事白话文小说写作的作家之一，多种版本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里均有述及。除此而外，还有民国时期的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她是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之一，在其回忆录里，记述了胡适在班芙的往事。

胡适与陈衡哲乃是同辈作家。在胡适眼中，陈衡哲曾是一位“女神”。1916年，他们在留美期间相识，尔后由相识而相知。陈衡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到：“我曾代表中国，到过四次太平

洋学会(民国十六年在檀香山,十八年在日本西京,二十年在上海,廿二年在加拿大之班府,与胡适博士交往甚多。”太平洋国际学会是最初由美国学者组成的一个国际学术团体,以亚太地区问题为关注内容,曾举办过13次国际年会,出版了千余种相关书籍,并在14个国家设立了分会,在联合国尚未成立之前,太平洋学会国际学术会议乃是世界级的大型国际会议,而中国学者陈衡哲则应是联合国成立之前,这一国际会议的中国女元老。

当年,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得到学会总会的支持和帮助。1926年6月,学会总干事梅勒(Merle Davis)访问中国,会见了20多位中国各界的领军人物,其中有范源廉、梁启超、王国维和胡适。同时梅勒还访问了清华学校、燕京大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并与这些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梅勒此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分会的发展,许多名人纷纷加入学会。

史料记载,1928年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改组,分设高级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高级委员会的成员是:余日章(主席)、赵晋卿、方椒伯、徐新六、王云五、刘鸿生、陈立廷、朱经农、刘大钧、俞庆棠。全国委员会由20人组成,他们是:唐绍仪、蔡廷幹、梁启超、熊希龄、周作民、宋庆龄、孔祥熙、曹云祥、伍朝枢、陈光甫、刘鸿生、宋汉章、温世珍、张伯苓、颜惠庆、严范孙、蔡元培、黄炎培、孙仲英、徐庆云。这份学会骨干名单囊括了许多民国政要及学界大佬,规格之高,至今无出其右。

甫久,胡适被推举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极力在学会中推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在1933年的第五届加拿大班芙会议的开幕式上,胡适重申:“这些问题是各国和各民族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是为这些国家和民族着想,为了一个民族或为了许多民族着想。这是最神圣的信托,但也是最危险的工作。这一工作在华人圣贤的口吻说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我们只能祛除偏见,去负这神圣的责任。”那年月,士林君子们的家国情怀,修身平天下的崇高理念,如今已经式微,几乎风景不再,但细小的

读者尚可从中感悟到这一切。

太平洋国际学会于1960年宣布解散,历年档案资料全部委托给加拿大UBC大学代为保管,至今收藏,为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加拿大学者提供了一个最为便捷的窗口。

胡适来加拿大演讲

又过了三年,1936年胡适再次途经加拿大温哥华,去美国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1937年9月26日,胡适与钱端升等人到达美国旧金山,受到民国政府驻旧金山公使馆的接待。其时正值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声援故国抗战的呼声日益高涨。直到1938年7月的十个多月的时间里,胡适在美国、加拿大各地巡回演讲,开展民间外交,争取国际支持。1938年2月3日,胡适在路途上分别致夫人江冬秀信札,致友人孙洪芬的信札,落款日期与地点均可佐证胡适当年应加国政府邀请,到访温哥华作演讲。

1941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授予胡适荣誉文学博士,同年,多伦多大学授予胡适荣誉法学博士,胡适均二次来加拿大,参加荣誉博士的颁授仪式。1942年2月,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再次应加拿大政府邀请,专程到访温哥华讲演。胡适日记提及此行,但未有详细记载。1971年,台湾出版了历史学家吴相湘先生所著《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一书中有过较为翔实的记述。他2月17日致赵元任信中也提及:“我匆匆出门,作七千里的旅行,动机是加拿大政府要我在VANCOUVER帮他们作一次Victory Loan的演说。”何谓Victory Loans(维多利亚债券)?

史料里记载,那是加拿大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起的一种民间募集资金形式,第一次国内募捐始于1915年11月,但是直到二年后这一称谓方才得以为公众知晓。从时间上看,这正是胡适在温哥华期间写下的日记。其实,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著述最多、影响最大,自传材料最丰富的一位文化名人,同时也是最被人议论,又最被人误解的名人。解读他的日记以及《四十自述》文牍,或可探寻胡适的早年思想状态,了解胡适何以淡出狂热的“五四”民族主义,解读他对战

乱中国的焦虑，至今仍然具有醒世意义。

错过胡适，错过人生一百年

民国史上，有句“世说新语”，那就是著名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如今此语出处无考，但适合那个年代的许多人文学者。1917年之后十年是青年胡适名满天下、如日中天的巅峰的岁月。他领导新文化运动，引领公众舆论，参与思想论争，时刻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胡适的名气自然也引起了不少年轻女性的青睐。

当年加拿大温哥华的华侨后代何桑（Bertha Ho Sang）女士，李美步（Mabel Lee）女士等，都

曾是胡适的铁杆“粉丝”，空留下太多的“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感喟。胡适自陈，男女之事，他从不造次。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他将自己的业余时间转移到文化收藏，共收集了约5千多个火柴盒贴纸，俗称“火花”，加上友人赠送的，最后都留给了大使馆。至于荣誉学位，也有30多个，不过都是人家送的，不算是他的收藏。

2017年12月3日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作者现居加拿大）

胡适的作文为什么得满分？

陈 新

1910年，胡适参加庚款第二批留美考试，共70个名额，他考了第55名，“很接近榜尾了”。国文试题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胡适“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就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明显偏题了。没有想到，阅卷先生大笔一挥，给分100。

作文满分，想来必有惊动。“原判”维持，胡适文笔的震慑，那是肯定的；要知道，他的不凡头脑，已经装载了超过同辈人的很多书籍，而且在中国公学编辑、主编《竞业旬报》之前、之中，一支笔在他手中已经运用自如。另外，众多阅卷先生、特别是领衔官员的宽容，更是“拨了千斤”。——胡适多年后在《四十自述》中说：原因是“那时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赏识这篇短文”。笔者过目的所有文字，都沿用胡适自己的这个说法。

窃以为，这肯定是个“美丽的误解”。江勇振说：“胡适说过，就可靠吗？”这句话并不怎样谬误。——谁都有局限性，胡适也会有一时的轻率。

如果这位先生以自己的偏好，来决定考生的成绩，从而决定考生一生的命运，来为国家选拔人才，那他也太浅薄颞顿了。以当时官费留学名

额之少，官方重视之厉（高）来推测，考官应当绝非等闲之辈。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位阅卷先生有自己的思考，他懂得一个道理：纠正偏题，只须一分钟的点拨；而一篇优秀的作文，那是才气和长时间的用功淬炼成的。这也许是一个常识——非常可悲——直到今天，常识仍然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理性，也是最容易罔顾的真理。

已故李慎之先生曾经对着数以万计的留学大军，感叹说：“这么多的留学生，怎么没有一个胡适？”这个“李慎之之问”透出多少悲凉！

原因是复杂的，而教育评价体系缺少常识，坚硬粗暴，不可商量，应当难辞其咎。

一百多年前的这位阅卷先生，是个真正的伯乐，他有着真正深邃的眼光。更珍贵的还在于：他的家国情怀，使他坚守常识，撇开成规，破釜沉舟地走向极端——多么惊心动魄的100分啊！

他为中华民族保住了一个胡适；也使自己青史留“名”——虽然他的其他，我们浑然无知。

所以，我们应该隔着时间的风云向他致敬！也向那个时代的温情致敬！

（作者现居上海）